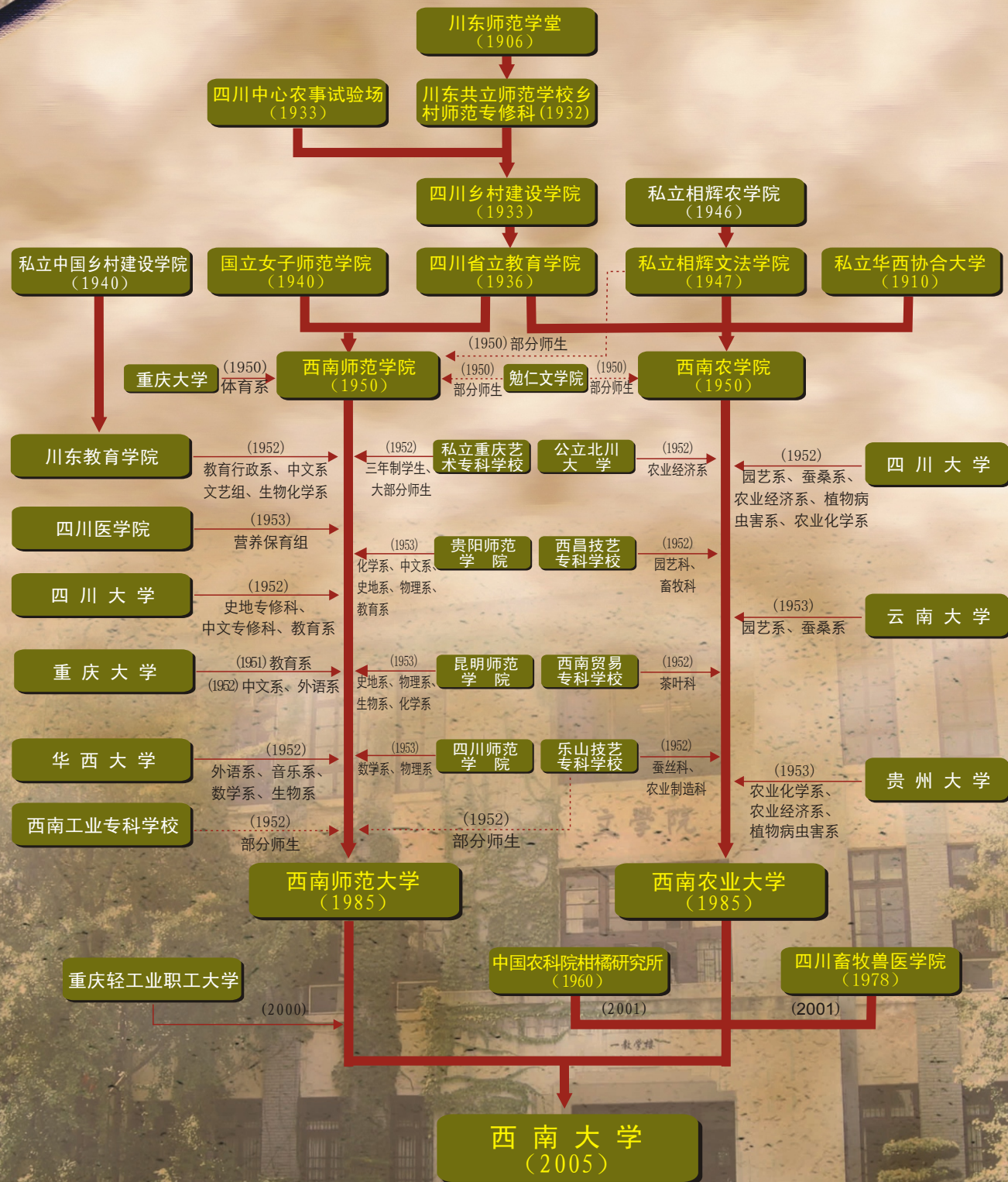




历史沿革

LISHI YANGE

西南大学记忆



◆ 名师风采

诗人已去诗长在
方敬年表

怀念我们的老师陈兆畦教授

◆ 档案拾遗

核档中的方敬

◆ 校史校情

西南大学寻根 (之五)

对面的中国西部科学院

黄房子的故事



主办：西南大学 档案馆
校史研究室

2010年第1期

(总第6期)

(注：2008年12月，西南大学档案馆经广泛查阅资料，修订并完善了西南大学发展沿革图)

五、方敬手稿

库里申科

这条大江从我家乡流过，
他志愿战斗我们的蓝天，
对中国抗战正义地支援，
在云端予侵略者以打击，
保卫中国的天空和土地。

这条大江从我家乡流过，
库里申科在我们的空中，
高翔着国际主义的英灵，
库里申科，在我们的江上，
^{永远}闪烁着光辉的 ~~生命~~ 生命。

这条大江从我家乡流过，
他象一道闪电掠过天空，
他象一声雷鸣响入江中，
天上以彩云 ^{向着你致敬} 如花环敬献，
江岸静默着翠柏 ^{苍和松}。

方敬诗作《库里申科》

※ 1939年5月，库里申科受苏联人民的委托，率远程轰炸机志愿队来到中国。他们率领的苏联空军支援队，一面直接参加对日寇的空军作战，一面担负着训练中国空军人员的任务。1939年8月中旬，库里申科在一次任务中不幸牺牲，把宝贵的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事业。

1995年12月

诗《库里申科》(手稿)是在原
应万州为苏空军抗日英雄纪念碑
刻碑而在原诗《库里申科》
基础上改写。

方敬家人为手稿做的书面注释

※ 方敬的诗《库里申科》(手稿)是应万州区为苏空军抗日英雄纪念碑刻而在原诗《库里申科》基础上改写。

六、方敬与挚友



1984年3月，方敬（右）在著名诗人卞之琳家中与卞之琳交谈

※ 方敬与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都是30年代中国新诗坛上兴起的新星，并且都成了新诗史上的著名诗人。



1976年4月，方敬（左）与其老友著名诗人何其芳在重庆北温泉的合影

※ 何其芳（1912年—1977年）中国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红学”理论家。四川万县（现重庆万州）人。方敬与何其芳是同乡，又是校友，后来二人又曾结伴到上海求学，两人都是新诗史上的重要作家。

刊首语

□文/蒋 涛

“东风染尽三千顷，白鹭飞来无处停”。如约而至的春天随着记忆之思不断蔓延。西南大学集体记忆的笔触，沿着校园道路的经纬、山脉陡坡的脊背、河流湖泊的堤岸，向四面八方悄无声息地晕染。

岁月不居，天道酬勤。一百多年来，西南大学人用燃烧的激情和滚烫的笔墨，镌刻关于大树、大楼、大师、大爱的传奇与期待。《西南大学记忆》始终以“记忆”为特色，充分利用档案馆馆藏的资源优势，细心挖掘校史中珍贵的档案、图片及文物资料，向读者形象展示西南大学百年风雨兼程中的此将彼扶，生动再现西南大学人勤朴忠实、锲而不舍的精神品格。《西南大学记忆》在西南大学人的引领下，寻找记忆、触摸记忆、拥抱记忆、感悟记忆。

《文心雕龙·情采》篇云：“虎豹无文，则鞞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西南大学记忆》在新的一年里将兢兢致力，以期质胜、文胜、人和。



西南大学记忆

2010年第1期(总第6期)

主办：西南大学 档案馆
校史研究室

顾问：张跃光 丁忠民
李 兰 徐仲林

刊名题字：袁隆平

主 编：邓 力

执行主编：蒋 涛

副 主 编：胡小京

执行编辑：李亚勍

编 委：邓 力 潘 洵 蒋 涛
刘重来 李亚勍

编 辑：岑家峰 高圣华 郝 龙
郝小玮 洪秋冰 刘广生
杨 希 徐 林

美 编：陈俊梁

校训：



目

刊首语..... 蒋 涛

名师风采

4 我与诗 方 敬

9 诗人方敬的人格魅力 吕 进

11 诗人已去诗长在 吴纯俭

14 方敬诗歌赏析

17 方敬年表

19 怀念我们的老师陈兆畦教授 万兆良

档案拾遗

21 校档中的方敬

封二、封三

校史校情

25 西南大学寻根(之五)

——西南师范学院的建立(上) 郝小玮

29 黄房子的故事 刘重来

33 对面的中国西部科学院

36 高校校史陈列馆的“文”“物”失衡及其矫正... 邓 力

录

校友天地

39 核物理专家的微观人生 郝 龙

西大地标

43 守望苍穹的毛泽东塑像 邓 力

45 塔柏的来历 王远伦 郭 兰

47 图书馆逸夫楼

他山之石

49 藏珍百年 文化传承

——记四川大学档案馆 刘广生

工作动态

53 全国农业院校档案工作协作组第二十一次会议纪要

54 2009 年档案馆校史档案征集荟萃 李亚勃

60 校史求证

61 西南大学关于征集校史资料及实物的通知

编读往来

63 致读者的一封信

Memory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让我们共同书写记忆,为
西南大学创造希望与奇迹!

本刊地址: 重庆·北碚
西南大学档案馆
校史研究室

联系电话: 023-68252544
15923240270

校史馆参观预约电话:
023-68252544

投稿邮箱: xdjy2009@126.com

邮 编: 400715

照 排: 重庆新综艺图文广告

记忆:



新诗抄本和几个诗集借给我们,作为一个小读者,我怀着天真的好奇心开始学读新诗。新诗引起了我对它的爱好。我初知道了几个诗人的名字,浅尝了他们的作品,当然还不懂多少。不过总觉得比以前念过的旧诗新鲜,一种新意能吸引人、启发人,新的思想感情和新的语言使我感到熨帖、亲切,新诗的种子就播进了我纯洁的心里,日渐萌长。

过了一年,我便到重庆上学去了。当时,我见到新诗就读。一般都是“五四”前后的抒情诗和二十年代前曾流行一时的小诗。读得懂、读不懂,不管它,只要喜欢,能读起来就好了。读来读去,也就读出来了。

一个星期六,我去看望一个长辈,在他家一间小屋子留宿。窗前小书桌上放着一个小本子,我拿起来随便翻翻,呵,里面全是抄的小诗,是泰戈尔的。泰戈尔!就是冰心女士喜欢读的《迷途之鸟》的作者印度诗人泰戈尔。这是我第一个遇见的外国诗人。十分惊喜,如获至宝,我取出随身带的日记本(幸好才新买来),就在暗淡的煤油灯光下抄起来,抄到深夜。这是我第一个外国诗的手抄本。从此我开始读一些译诗,就这样与外国诗结下了不解之缘。

自由漫读,自己摸索着读,爱怎样读就怎样读。读下去,渐渐地读多了,各家诗的养分在自然地摄取

融化,不同的诗的不同精神气质和艺术风格同时在熏陶一颗幼稚的心,逐渐培养起来它的诗感,一颗心对人生艺术地敏锐的感觉。

积年累月,新诗已成了我的精神伴侣。

至于古典诗词,国文课内比较系统地讲授词选,甚至还出题要学生从欧阳修的词里选出艳词来,我竟胡翻完了《六一词》,从中瞎抄了一些来交卷。但是我爱读的却是李煜、李清照的词,洗练明洁,不消几笔就巧妙而生动地描写出意境和心情。“剪不断,理还乱”,“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过去舅妈教我念李白的《静夜思》和好邻居教我念杜甫的《前出塞》启蒙学诗起,我读过一些古诗,特别是唐诗,对于中国古代诗词,我喜爱诗甚于词。在词中,无论内容或形式,我觉得切近于诗的比较,过于铺张堆砌的长短句总不如诗纯,这也许是一种偏见。写滑了的写油了的词读起来可不大好受。

新诗、外国诗和中国古代诗,都像是当时我自选来哺育我的稚心的灵粮。但是并没有事先蓄意要写什么新诗,而以后竟然又写起新诗来,几年来读了这样一些新诗,仿佛也多少懂得一点怎样写新诗,有时也就想写,自然而然地居然开始动起笔来。心有所感,有了写作的冲动和要求,也就爽性乱涂几行,好歹写着玩的、信手写,随写随扔,管它的。究竟写了一些什么,如同隔世,早已忘却了。只记得有一首诗,一个朋友曾拿去在他自己办的小刊物上发表过,其中大致有这样几句:

把一粒是石子扔进水里,
听到的是我生命的声音;
谁悄悄递一张手绢到手里,
紧握住的是一颗温存的心。

现在想起来这样的诗行虽幼稚可笑,但倒也还显得天真可爱。

预科毕业后,学习生活发生了波折,我失学了。我只得回到四川家乡去,在沿江的旅途中,我也写过几首诗,后来在成都报纸的副刊上登载过。在《眺望》中,“那江上摆着的沙丘/沙丘上寂寥的飞鸟/——我心境的写照。”这是我失学后低沉的情绪。我困居家中,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我的生命向我垂首”。



年轻时的方敬

让后来者与前行者
同结一条长长的绳

这条“绳”，现在已经结得很长了。如今，方敬的弟子们，有的在国外攻读，有的已经晋升高级职称。在海内外的诗坛上活跃着这一群年轻的身影。开门弟子柳扬已经出过一本关于象征主义的著作，后来来到英国伦敦大学深造，现在在澳大利亚；颇为方敬看好的品学兼优的87级硕士生胡兴是新诗研究所“臧克家奖学金”的获得者，现在在国外也有成就；方敬赏识的女弟子邵薇后来成为台湾“薛林青年怀乡诗奖”的第一个获奖者，最近又在美国获得罗娜·杰菲基金会的“女作家奖”，成为此奖的第一个中国得主。

方敬以他的博学多闻，有学有识赢得研究生们的敬重，新诗所这些年轻人嘴中的“方老”几乎就是“智慧”、“博雅”和“风趣”的代名词。他们爱他，敬他。1992年以前，每届研究生举行学位论文答辩时，方敬都是答辩委员会成员。他这位答辩委员知识渊博，学贯中西，妙语连珠，而且又是新诗发展史上不少重要的人和事的见证人和亲历者，所以，他的到场，对确保答辩的质量和档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方敬的风趣又总是给答辩的严肃氛围增添活跃和轻松。新诗研究所每年的答辩会，都由于答辩委员会的认真与严肃而拖得比较长。有好几次，到吃晚饭时间还欲罢不能，只好给师生和旁听者分送面包，大家一边吃，一边继续工作。一次，也是在这样的紧张节奏中，许是感到了气氛的沉闷，方敬开始活跃了。一篇学位论文是研究艾青的，作者认为，艾青的作品广泛吸取了西方诗歌的艺术经验，这些经验都实现了本土化的转换，这是艾青诗歌道路的重要特征。

“本土化！”方敬不露声色地说：“那么，请你说一下接吻怎样本土化？”

会场活跃。本来已经十分疲惫的人们打起精神来了。

然后方敬提高嗓门自答：“本土化的接吻，嘴老是碰不到一块儿。那些中国电视剧里，男主角的嘴快要碰到女主角的嘴的时候，怎么一偏，又到耳朵上去了。”

全场大笑，几乎是人人前仰后合，不管是台上的还是台下的。

“而且，最后连耳朵也没有碰到。”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这时候他露出教授的真面目了，一下子改换了语调，严肃地说：“说着玩的。请继续。”然后，偏过头来，对着坐旁边的我，会心地一笑。

方敬去世的前两年，因为年事已高，没有能再参加答辩委员会。每当举行答辩会时，我都有孤独之感，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深深的遗憾。

本文选自《吕进诗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版，文章略有改动。



1994年方敬(右二)参加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会

(责任编辑:高圣华)

为主。每周二至三期。稿件来源,有靳以、以群代约的稿;李广田在西南联大约的稿;延安来的稿,还有选自他执教的贵大学生主办壁报的稿件等等。发表过一批诸如郭沫若、茅盾等名家的作品。他主编的《阵地》副刊,不但是当时的贵阳,即使是西南各省,也算得上是佼佼者。

方敬老师住在林场,林场是贵大的教授宿舍。它处在校本部与我居住的法商学院的杨家山之间,前临一条通往花溪的马路,傍有绿草如茵的南湖;这南湖,遇雨季时,湖中波光粼粼,常有水鸟飞翔;林场后靠一个小山坡,山坡后,是通往青岩的公路。整个林场四周,是一丛丛碧绿的杨槐树,散发着诱人的清香,是一个幽静的好地方。

当我每次去校本部L教学楼上课时,不时会碰上方老师偕夫人何频伽(何其芳胞妹)带着两个小孩站在家门口,他们的家就是抗战期间那种特有的泥墙草顶的土舍;有时也遇上方老师从对面南湖散步回来。在这种情况下,我都要走上前去,向方老师请教一些有关写作上的问题。

在方老师主编副刊《阵地》的近三年中,我先后



1947年方敬与家人在贵阳的合影

在这个副刊上发表过两篇散文和八首诗。这些诗文都是经过方老师亲自修改和润饰的。记得有一次,就在马路旁,我们谈到写作时,他说:“我的散文《善恶的边缘》、诗《荒谬的时钟》与《给少年维特》写得比较好。”

《善恶的边缘》,写于抗战刚胜利,蒋介石立即发动全面内战。当时国民党统治当局对革命者开展疯狂血腥的镇压,而革命者随之也展开积极的斗争。在那复杂的情况下,我写作时比较隐晦,把当时的两条路线,用红发的恶魔比作右派,而把银发的和平老人,比作革命左派。最后,和平的银发老人战胜了邪恶的红发恶魔,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方敬老师说:“你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寓意深刻,对现实是有积极的意义的。”这篇《善恶的边缘》发表在1945年11月的贵阳《大刚报》,同月,即被汉口《大刚报》文学副刊《大江》全文转载。

方老师接着说:“我那篇《荒谬的时钟》写得较有特色。《荒谬的时钟》写的是当时花溪大桥南端的那座经常停摆的时钟。因为那座大钟经常停摆,给来往行人一个错误的感觉。”记得我在诗中这样写道:“像没有合拢的嘴巴/把谎言散播给世界/原是白天的里程/而你,却正奔着黑夜的路……”这首诗,我是讽刺国民党统治当局“颠倒黑白”用“谎言”欺骗老百姓。方老师说:“很有诗意,对现实是一种鞭挞。”

方老师最后谈到我那首《给少年维特》的诗。我在诗中写道:“夏绿蒂现在已来了花溪/住着那间红色的小屋/谁能相信,夏绿蒂也做了吉普女郎”;“阿伯尔,每天坐在茶亭/玩着桥牌/用扑克卜着命运/听说他隔天要去重庆/探听黄金生意……”

夏绿蒂和阿伯尔,都是《少年维特的烦恼》一书中的主人公。我在诗中借用来比喻当时抗战期间大学里的公子和小姐们,他(她)们醉生梦死的生活。“下海”是五十年后的今天才有的新名词,而当时的大学生就有做黄金生意的。方老师笑笑说:“你的这首诗,像一根根鞭子,抽在他(她)们身上。”

方老师除编《阵地》副刊外,在抗战胜利后,还和潘家洵、吕荧、祖文创办《时代周报》,方敬任主编,何潮辅佐。当时正是全国学生运动高潮时期,争和平、争民主,反内战、反独裁,为了呼应昆明西南联大闻



一多、李公朴两教授被国民党暗杀的抗议活动,《时代周报》发表了《反内战专刊》和《纪念闻一多李公朴特辑》。方敬老师发表了《不朽的灵魂》(周报二期),还发表了《胜利以后》一诗,揭发和痛斥了统治当局大员发国难财和“劫收”的罪行。方老师的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赶路人忙迫的步履,
忽然停止在失望里,
全民族的热情
冻结在人类的海洋里。
天空,河流,陆道
都是胜利的一
我们前面有路无路?
满车、满路、满飞机过重的
是官价、法币、私情、野心;
那见不得阳光的黑票、黄鱼,
怎能引你昂然上前、中国。

方敬悼念闻一多的诗和《胜利以后》在贵阳发表后,统治当局惊恐万状。在他执教的学校,校长出面请客吃饭,始则劝戒,继则警告;贵阳统治当局则大肆叫嚣说:“贵阳本来是一杯清水,现在都给《大刚报》《阵地》和《时代周报》搅浑了。”还恐吓说:“闻一多是一个书生,不懂政治,把老命都丢了,还要出什么《时代周报》,庆祝普罗作家茅盾五十寿辰专刊。”方敬老师说:“呸,贵阳不但要清水,我们还要使它变成蒸馏水!”以示抗议。

贵阳的反动派恼怒了,迫害开始了,方敬被列入黑名单。贵阳一时弥漫着白色恐怖,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方敬老师在以后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者不顾全国人民对和平民主的要求,悍然发动内战,镇压群众运动,迫害进步人士,我也上了黑名单,敌人的黑手伸向了我,但得到同志和朋友的关切和照顾,我机警地从险恶的处境中溜掉了。”

方老师“溜掉”后,曾在重庆女子师范学院、重庆大学任教。解放后,在西南师范学院任院长、教授等职。“文革”时,方老师在贵阳主编《阵地》和创办《时代周报》的一段地下工作,被横加罪行,成了罪人。说为什么没有被反动派逮捕?还狂叫没有被捕的也是

反革命,不然为什么不被抓呢?方老师严词对答说:“毛泽东同志一生从未被捕过,他是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在狱中仍坚持斗争,领导革命。如果革命者都应该被抓,抓去了不死便叛,那世界上还有什么革命者。”由于这样,方敬老师长期关在“牛棚”里,备受拷问逼供,身体遭到严重伤害。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方老师被落实了政策,洗清了强加给他的一切不实之辞。

1980年下半年,方老师又作了一次花溪之游,写下了《贵州行》一诗,对花溪旧地重游,抒发了无限的眷恋之情,热情洋溢,句句表达在字里行间,他这样写道:

斟满三十多年的空杯,
邀来云水为今日祝饮,
不忘昔年风云,碧云悠悠,
扰忆往日浊流,溪水清清。

过去喝着茨藜味苦,
苦酒一口也难咽吞,
解不了我心头的恨,
消不了我心头的愤。

新酿的茨藜可令人醉,
一杯更比一杯香甜,
乌云蔽天,谁愿抬起望眼,
美景无限,可百看不厌。

方老师的这首《贵州行》“花溪野宴”的诗,诗人用比兴的手法,尽情作了新旧社会的对照。“茨藜”是贵州的著名特产茨票酒,“碧云”是指花溪的碧云窝,“溪水”是指花溪水,都是花溪的胜景。也是方老师当年在花溪时常去的地方。想到往昔“解不了我心头的恨”,看看今天,止不住“美景无限,可百看不厌”心头的喜悦。

方老师在1992年年近八旬高龄时,写过《影子与回声》一诗,他这样写道:

我若是我影子的影子

(下转第14页)

作品赏析:1985年11月到1988年9月,诗人方敬晚年创作了的一批赋体长诗,包括《高楼赋》、《祝愿赋》、《生命赋》和《季候赋》等。其中这里选登的《季候赋》很有韵致,秋去冬来,春华秋实,一年四季,人生现实。“爱像一个吻/追求是一个梦”;炼火燃烧,离天堂和地狱一样远近;“大漠里骆驼的脚印/不久便被砂粒填平/瀚海渗透了它的坚忍”。人生就是这样,在时光的演变中不断探索,不断创造,不断前进,我们得为所有的季节珍惜。

这些诗体现出诗人用敏锐的目光审视现实和历史,咀嚼生活的感受,思索人生,并把感觉升华成生命体验,然后外化于诗。它体现出冷静的思考,热情的内敛,人生追求与艺术创造的妙合,哲人的理智与诗人的情怀相交融,格调完全是现代的,与“中国新诗派”(“九叶诗派”)的诗风极为相近,甚至可以说同出一宗而趋于现代诗的前沿。

他的赋体诗浑厚而博大,优游而坚韧,复杂又单纯,凝聚了诗人晚年的全部心血。没有他的毕生经历,没有敏锐的感受和冷静的思考,没有数十年的创作经验与对新诗现代化的孜孜追求,都很难完成这样的创作。应该说,这是方敬诗歌艺术上的一次突破,一大丰收。

诗人与普通人一样,在漫长的历史之河中,每个人都只能是“短暂的过客”,但是,诗人的魅力在于他留给当今和后世的“长久的梦想”。如果说这一时期的方敬早过了作诗的年龄,那也只是生理上的年龄,因为艺术上的青春有时候是与生理年龄无关的。诗人方敬就是凭着心理上的不老青春,在诗歌创作上展示出艺术上的不断发展与超越。

方敬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既具有丰富的阅历,对人生与艺术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又具有向前看的心态,在对过去、现实的审视中,思考着人生的真谛,渴慕着未来的美好。这使得他的诗具有了深度、广度和青春般的生机与活力。方敬诗歌的一贯主题是对生命的爱。在新时期他的诗歌中的爱体现为:明朗、执着、欢快,因为爱而赞美、渴望、追求。

方敬不是那种狂飙式的歌者,也不是那种浅吟低唱的诗人。他总是循着自己的内心体验,唱着属于他自己的歌。虽然这时期的作品几乎没有直接针

对现实的所谓大事件而抒写的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诗人脱离现实与人生,相反,是体现了诗人对自己内心体验的尊重。诗人总是把对人生的看法与态度融合进自己的体验中。诗歌的题材本无大小之分,而诗的包容量却又大小之别,所谓“一花一世界,一首一如来”就是这个道理,诗人创作往往在点滴之中来抒写大千世界。方敬对于生命之爱的抒写即是如此。在诗中,生命不应该是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是包容在现实之中的独特的存在。方敬把生命之舟放逐于时代、民族、自然、社会、艺术等因素之中加以把握,这就增加了他的诗的具象性、可感性与启示性。

诗的最深层的内涵是人生哲学。这种“哲学”不是一门学问,而是一种精神,是诗人对人生的规律性认识,是诗所体现的对人生的深刻、全面的体悟。方敬的诗在形象抒写的同时,常常还渗进了一些警句式的诗行、诗节,它们与诗人的体验融为一体,又有一种独特的审美功能,恰如锦缎上的精美刺绣。

方敬的诗歌在语言上也体现了精巧与朴素的结合。说它精巧,是诗人很讲究诗歌语言的选择和运用,主要在一首诗歌的整体氛围中构筑语言风格,在节奏、韵式以及语言自身的搭配上都显出了特色。朴素则体现在诗人使用的语言没有晦涩、古奥的毛病,大都源自生活本身,有经过诗人的艺术加工与选择。这种语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既有丰富的生存土壤,又渗进了诗人独特的创造。

参考文献:

- ①刘扬烈. 方敬诗歌创作片论 [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06期
- ②蒋登科. 晴天的思绪 [J]. 重庆社会科学.1994年04期

(责任编辑:杨 希)

方敬年表

- 1914年 4月26日出生于四川万县,祖籍四川奉节。原名家齐,曾用远兹、杨番、一无等笔名。
- 1920年 1920年,进私塾读书。父亲去世。
- 1921年 先后在万县第一高小、万县南浦初中、重庆南岸初中读书。对1926年9月5日英国军舰炮击万县的血腥惨案终身难忘。1927年下学期在万县南浦初中开始接受、喜爱新文学。
- 1929年 与何其芳等友人结伴到上海,考入中国公学预科,开始学写新诗。毕业后,因生活坎坷而辍学。
- 1931年 先后在四川万县中学、云阳初中和垫江初中作英语教员,为以后读大学攒积资金。在垫江,开始陆续在北京和上海的报刊上发表诗和散文。1933年发表处女作《馈赠》。
- 1934年 考入北京大学外语系,攻读英国文学。参加“一二·九”运动。陆续在《文学季刊》、《文季月刊》、《新诗》、《大公报》副刊和《文艺》等刊物上发表作品。早期诗歌作品后来结为诗集《雨景》(1942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 1935年 4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早期散文结集《风尘集》。7月,抗日战争爆发。9月,与何其芳及妹妹何频伽撤离沦陷的北平,辗转回到四川。借读于四川大学外语系。
- 1938年 在成都与何其芳、卞之琳、朱光潜、谢文柄合编《工作》半月刊,宣传抗战,针砭时弊,伸张社会正义,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9年 1月,任中共地下四川大学文学院支部书记;不久,中共地下成都市委表彰为模范共产党员。8月,大学毕业后,到四川罗江国立第六中学四分校任国文和英语教员。根据川康临时工委指示在该学校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与同校执教的李广田、陈翔鹤指导学生文学刊物《锻冶厂》。
- 1940年 7月,离开罗江四分校。8月,到成都协进中学任英语教员。
- 1941年 2月,因皖南事变发生,与妻何频伽一道半夜由成都紧急疏散,辗转月余到昆明。先后在昆明昆华女中和昆明南菁中学教英语。
- 1942年 2月,赴桂林,在桂林中山中学和中正中学教英语。创办“工作社”出版文学丛书。
- 1943年 第二本诗集《声音》出版(桂林工作社),翻译出版托尔斯泰中篇小说《家庭与幸福》(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
- 1944年 1944年2月,出版散文集《保护色》(桂林工作社),翻译出版托尔斯泰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944年,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1944年9月,独山失守,桂林告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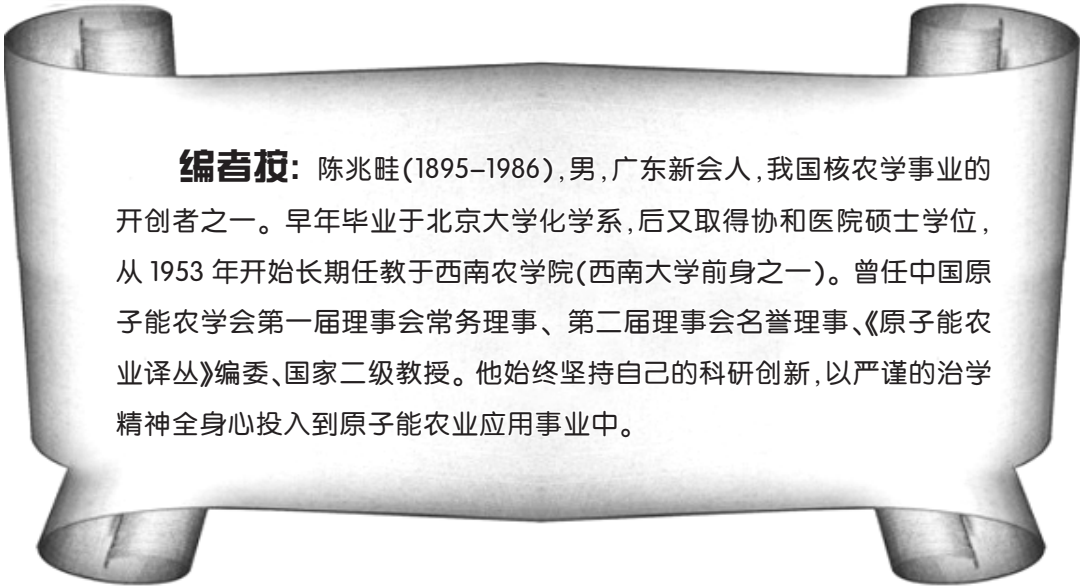
- 逃难到贵阳。历任国立贵州大学外语系讲师、副教授。同时主编《大刚报》文学副刊《阵地》，发表抗战文艺作品。抗战胜利后与潘家洵、吕荧、祖文等编《时代周刊》，争和平、反内战、争民主、反独裁。翻译出版了狄更斯的《圣诞欢歌》(1945年，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
- 1947年 3月，为逃避反动当局的毒手，转徙重庆，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重庆大学教授、相辉学院外语系主任。1948年，任《中国新诗》编委。这一时期出版了诗集《行吟的歌》(1948年7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散文集《生之胜利》(1948年11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记忆与忘却》(1949年8月，上海文化工作社)。
- 1950年 10月，调西南师范学院工作，历任外语系教授、系主任、中共西南师范学院支部书记、副教授长、教务长、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在繁重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从事翻译和写作。5月，参加重庆市第一届文代会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重庆分会副主席。
- 1952年 9月，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翻译工作。同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
- 1953年 4月，任西南文学工作者协会委员。
- 1954年 12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 1956年 5月，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理事。
- 1966年 文革开始后受迫害。“文革”中期开始自学西班牙语、德语。
- 1975年 12月，任四川省中外语文词典编写领导小组成员、《汉语大字典》四川编写领导小组副组长，参与主持编纂《汉语大字典》十余年。
- 1979年 10月，任《汉语大字典》领导小组成员。当选为四川省文联第二届副主席、四川作家协会第二届副主席。
- 1981年 1月，当选为重庆市文联第三届主席、重庆作家协会第一届主席。11月，诗集《拾穗集》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 1983年 2月，散文集《花环集》出版(重庆出版社)。9月，任中共四川省党史工作委员会顾问。
- 1984年 4月，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英国，出席英国笔会为第六届作家节举行的国际学术会和英国诗会成立75周年纪念会。
- 1985年 任重庆新诗学会会长。担任中国各体文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四川省作协第三届顾问。重庆地区抗战文艺研究会会长。
- 1986年 10月，离职休养。12月，任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四川省分会理事。
- 1987年 7月，担任《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编委、副总主编。
- 1988年 6月，举行“方敬诗歌朗诵会”(重庆人民广播电台、《红颜》文学杂志社、重庆新诗学会主办)。12月，获首届四川郭沫若文学奖、第二届四川文学奖荣誉奖。
- 1989年 3月，任诗刊《银河系》主编。4月，诗集《花的种子》出版(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9月，以诗集《拾穗集》、《花的种子》获建国40周年重庆市文学奖。
- 1990年 4月，与何频伽合著的《何其芳散记》出版(四川教育出版社)。10月，诗集《飞鸟的影子》出版(重庆出版社)。
- 1991年 4月，《方敬选集》出版(四川文艺出版社)。5月，担任四川省文联第三届顾问、四川省作协第四届名誉主席。
- 1992年 2月，被推选为重庆市文联第四届名誉主席。
- 1994年 4月，“方敬创作六十周年、八十华诞座谈会”举行(四川省作协、重庆文联、重庆出版社、《银河系》诗刊等单位主办)。
- 1995年 10月，任重庆市作协第三届名誉主席。
- 1996年 3月17日，病逝于重庆第三人民医院，享年82岁。

本年表摘自方敬著《馈赠》，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责任编辑:杨 希)

怀念我们的老师陈兆畦教授

□文 / 万兆良^①



编者按：陈兆畦(1895-1986),男,广东新会人,我国核农学事业的开创者之一。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后又取得协和医院硕士学位,从1953年开始长期任教于西南农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曾任中国原子能农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第二届理事会名誉理事、《原子能农业译丛》编委、国家二级教授。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科研创新,以严谨的治学精神全身心投入到原子能农业应用事业中。

我们尊敬的老师陈兆畦教授,于1986年2月7日与世长辞,作为学生的我们万分悲痛。在纪念陈老师逝世一周年的今天,他那孜孜不倦的工作热忱,坚韧不拔的毅力,严谨治学的精神,实事求是和关心他人的作风,历历在目。他是我们永远崇敬和爱戴的前辈。

陈老师于1895年出生在广东新会县,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1924年在协和医学院生化系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曾先后任教于北大、协和医学院和上海交大。1947年任中国西部科学院理

化研究所主任,1951年任西南人民科学馆副主任委员兼西南师院教授,1953年任西南农学院土化系教授。曾先后当选为四川省第一、三、四届人大代表,重庆市政协第一、二届委员。

早在学生时代,陈老师就受北伐战争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决心把自己的全部知识奉献给人民。新中国成立后,他始终为祖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埋头苦干。在十年内乱中遭受迫害和摧残之后,陈老师仍一如既往地忘我工作。1980年他85岁高龄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①万兆良,曾师从陈兆畦老师学习核农学,1960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土化系。曾担任中国原子能农学会理事从事生物物理工作,尤其是同位素农业应用。在1987年陈兆畦教授逝世一周年之际,特写这篇短文,以表对先师的怀念。



陈兆畦教授在学校生物实验室进行生物固氮的研究

陈老师热爱科学事业,治学严谨。他基础知识雄厚,对生物化学、营养化学、农业化学及原子能农业应用,都有较深的造诣。除致力于教学工作外,在科研中取得了二十多项成果。

1956-1957年,陈老师曾在苏联科学院生物物理所进修,回国后即把全部精力投身于我国的原子能农业应用事业。他在中国农科院举办的同位素培训班上授课,为培养大批奠基人才作出了贡献。

1959年陈老师回到了西南农学院,即着手筹建同位素实验室。在他的关心和指导下,该室技术力量和仪器设备不断充实,现已具有2万居里照射源和全新的同位素实验大楼,担负着全校核农学的教学任务,承担了全国和省、市下达的多项科研任务,并且取得了可喜成果。

陈老师总是诲人不倦,谆谆善诱地关心着中青年教师的成长。他经常告诫我们:“对待科学要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刻苦钻研,丝毫不能有半点马虎。如果要想在科学事业上取得一点成就,一定要下苦功夫,脚踏实地地干。”这是他数十年经验的结晶。对于中青年教师的科学研究,他经常给以具体的指导,甚至对项目选择、研究内容和方法等都提出具体意见。他还细致批改科研论文和译文,认真解答提出的问题。陈老师为培养研究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带研究生严格认真,从不马虎。甚至在晚年行动不便的时候,仍坚持给研究生上专业课和英语课,在病故前十多天还在给研究生布置寒假作业。三十多年来,陈老师培养了数十名研究生和成千上万大学生,真是桃李满天下。

陈老师非常热爱和关心学会工作,直至古稀之年仍主动争取参加学会活动。1980年中国原子能农学会召开成立大会,他非常兴奋,不顾年老体弱,千里迢迢从重庆赶到杭州,到会祝贺并鼓励与会代表为原子能农业应用事业作出贡献。

1990年学会无性繁殖作物专业组在北碚召开会议,年近90高龄的陈老师到会看望各地代表,鼓励他们勇攀高峰。有些活动不能亲自参加,他也认真写出书面意见。陈老师还用各种形式宣传和普及核农学基础知识,促进同位素示踪技术在各专业中的应用。

陈兆畦老师为党的事业,为祖国四化建设,兢兢业业,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科学和教育事业。他的高尚品德和革命精神,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时刻激励着我们前进。

本文选自《核农学通报》1987年02期

(责任编辑:杨希)

二、方敬与中国诗人、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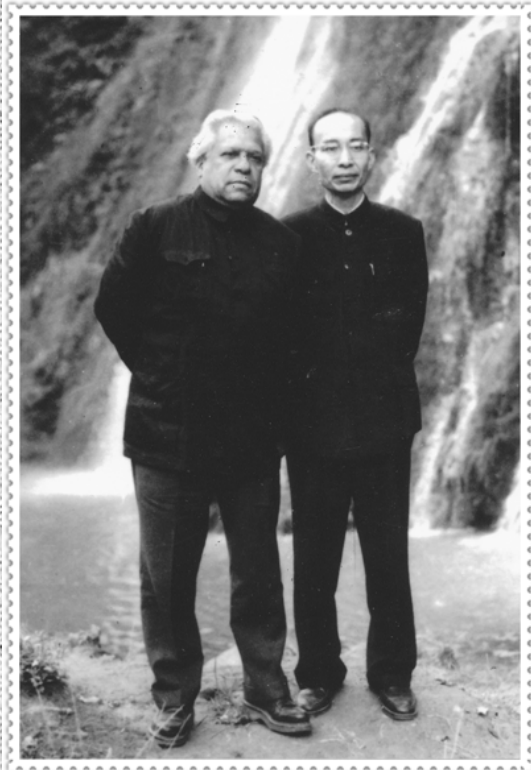


1955年，方敬(前排右一)参加全国作家参观访问团



1984年3月，方敬(中)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英国时，与李国文(左)、冯宗璞(右)的合影

三、方敬与外国诗人、学者



注：尼古拉斯·纪廉于1902年7月10日出生在古巴，从1930年起从事诗歌创作，1933年完全投身于诗歌与新闻事业。1937年加入古巴共产党。他是古巴黑人派代表作家，他与本派作家一道，运用黑人民间诗歌的韵律或以黑人生活作为题材不断地进行创作。

方敬与古巴著名诗人纪廉在重庆南温泉合影



方敬(右二)在学校会见日本著名学者清水茂一行

注：清水茂，日本当代著名汉学家，诗人，学者。

四、方敬参加学术会议



1989年方敬(中)参加全国第四次老舍学术讨论会



方敬(中)参加《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编委扩大会议

(责任编辑:郝小玮)

西南地区公立高等学校数量虽多,但存在着课程紊乱、设备简陋、人事复杂、专业设置重复、规模过小等问题,不适应社会对人才的急切需求。于是,在1950年上半年,西南文教部在深入调查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和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并广泛听取两院教职工和学生的意见后,开始着手两校合并事宜。8月17日由川教院教育系周西卜教授担任主席,成立了西南师范学院筹备委员会。9月27日,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向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提出了两院合并的报告。10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同意将原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和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合并,更名为西南师范学院(以下简称西师)。至此,西南地区第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在重庆诞生了。^①

合并前,川教院设有教育系、国文系、外文系、史地系、数学系、农艺系、农产制造系、园艺系、生物系,教职工106人,学生529人;女师院设有教育系、国文系、英文系、史地系、数学系、理化系、音乐系、保育系、美术工艺系和体育专修科,教职工107人,学生603人。合并时,将系科进行了调整。全院设教育系、中文系、外语系、史地系(包括历史组和地理组)、数学系、理化系(包括物理组和化学组)、生物系、音乐系、美术工艺系、保育系和体育专修科。同时,将川教院原有的农艺系、园艺系和农产制造系迁往北碚新建设西南农学院。原相辉学院及原私立勉仁学院的部分教师调来西师。1950年12月,重庆大学体育专修科并入西师。至此,全院共有教师146人,职工193人,学生907人。^②

二、院系调整与迁校

为了适应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发展对人才的急需,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的“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进行了院系调整。

在调整过程中,先后并入西师的系科有:四川大学教育系、教育专修科、中文专修科、史地专修科;重庆大



谢立惠(1952年任西南师范学院院长)

学中文系、外语系;华西大学数学系、生物系、外语系、音乐系;川东教育学院(原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教育行政系、中文系文艺组、生物化学系以及西南工业专科学校和乐山技艺专科学校部分师生。

同时,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将设在北碚的原川东人民行政公署及川东区党委的驻地作为西师的新校址,并要求在院系调整的过程中,迁往北碚。这在全校师生员工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少数人认为北碚远离重庆市中心,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对外联系不方便,迁到北碚对学校的发展前途会有不利影响。但大多数人认为北碚风景秀丽,环境安静,发展空间大,且有较好的文化底蕴,适合办大学,赞成迁校。

从9月21日开始,全校师生员工陆续从九龙坡、磁器口、沙坪坝向北碚迁移。10月2日西师北碚办事处成立。10月9日,院部行政机关及干部迁至北碚。从

^① 《西南师范大学校史》编修会,《西南师范大学校史》,第72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00年版。

^② 《西南师范大学校史》编修会,《西南师范大学校史》,第74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00年版。

革,并逐步增加了一些中国特色。教学质量有了一定提高,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工作的能力有所增强,为国家培育了一批优秀人才。^⑤

3. 积极开展科学研究

1954~1955 学年度,学校提出:要鼓励教师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创造科学研究的工作条件,组织专题报告会、讨论会等,逐步培养科学研究的兴趣和能。已有条件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教师和教学组织,应拟订科学研究计划。研究内容必须首先围绕教学,适合教学需要;其次适合中学需要,研究师范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实际问题;再次才是有关国家建设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问题。

1956 年,全院的科研工作更进一步地开展起来,有 272 位教师参加了科学研究,提出的科研题目共 228 个。同时,学生们的科研热情也空前高涨,在高年级的学生中,成立了 14 个科研小组,参加的学生达 750 人,占全校学生的 24%左右。并于 8 月 25 日至 9 月 3 日,举行了学生科学研究的成绩展览。为了及时报道全校科研状况,刊登科学研究的成果,促进科学研究的开展,《西南师范学院学报》于 1957 年元旦正式出版。^⑥

4. 加强青年教师培养

学院在进行教学改革,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过程中,十分注意教师的培养提高工作,努力建设一支高质量的教师队伍。由于学校的规模扩大,学生人数增加,教学任务十分繁重。客观形势要求抓紧培养青年教师的工作,把培养助教列入工作计划。1954 年 2 月 25 日教务处制订了《培养助教暂行办法》,在实际工作中坚持“政治与业务结合”、“集体培养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原则,助教提升很快,开课的人数也逐年增长。1952~1953 学年,有 30 人开课;1953~1954 学年有 54 人开课;1954~1955 学年有 70 人开课。到 1955 年底,全院有助教 182 人,开课的助教占总数的 38.5%。到 1956~1957 学年,这些助教大都能独立开课。^⑦

5. 开展对外交流

建校之初,学院先后接待了 34 个国家 15 批团组 163 名国际友人来校参观访问,进行学术交流。这些友好交往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院工作的发展。^⑧

同时学校还加强了与国内高等学校的交流,并与四川师范学院和贵阳师范学院合作,加强了与兄弟院校联系。

学院从 1950 年建校到 1956 年,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南大学全景图

(责任编辑:郝小玮)

^⑤ 《西南师范大学校史》编修会,《西南师范大学校史》,第 103-106 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 年版。

^⑥ 《西南师范大学校史》编修会,《西南师范大学校史》,第 108 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 年版。

^⑦ 《西南师范大学校史》编修会,《西南师范大学校史》,第 110 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 年版。

^⑧ 《西南师范大学校史》编修会,《西南师范大学校史》,第 112 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 年版。

初,算得上是很高级的住房了。两排黄房子共6幢,一排3幢,每幢2个单元,有2个楼道,各通4家,6幢共48套。每家住房面积不足60平方,均为2室1厅1厨,另有一个小凉台和一个小储藏室。有趣的是,那不大的客厅竟有5个门,分别通凉台、厨房、外门和2个卧室,由于门多,家具都不好摆放。

更有意思的是,没有卫生间。在那个年代,对于职工住房,建筑师似乎根本没有设计卫生间的念头(如今黄房子里的卫生间还是80年代扩建的)。于是各家各户都在小凉台上放一只马桶,用席子一遮,权当卫生间。不过那时各家各户都不必为“倒马桶”费心,因为附近的农村生产队早已将西师住户的马桶“分片包干”了。每天定时都有农民(多半是妇女)挑着粪桶挨家挨户“倒马桶”,并负责洗刷干净。须知在那个年代,中国大部分农村还没有化肥,人粪尿就是最好的肥料。为此,附近生产队还常常为“争地盘”发生争执。

(三)

说起来,我家还是这两排黄房子的第一个入住者。1952年9月,西师由沙坪坝磁器口举校迁北碚,但那时父亲正好在北京师大教师进修班学习,听苏联专家授课,所以全家未能与西师一起搬迁,仍住在父亲原来工作的地方——沙坪坝南开中学津南村。父亲曾在南开中学任教11年,担任过教导主任,从



“四新村”村牌

1946年起被四川教育学院和重庆大学教育系聘为副教授,解放初高校院系调整,并入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母亲在南开小学任教,担任过小学校长。

那个时候,西师建校不久,交通工具极缺,不少教职工搬迁,竟是用板车从沙坪坝沿公路拉到北碚的。1953年7月,父亲进修结束,母亲也正式调西师教务处工作,才开始做搬迁的准备,并等着难得空闲的卡车何时来搬运。

大约是10月的一天,一辆西师的卡车突然停在了津南村7号我家门口,那时没有电话,事先也不知道,司机说是来为我们搬家的,但卡车上已装了半车货物——实际上是拉货顺路来的。等我们七手八脚把全部家当搬上卡车,卡车车厢已堆得高高的如同一座小山。母亲和妹妹去乘公共汽车,而我和哥哥(双胞胎)则坐在这高高的“小山”上。当时重庆到北碚的公路还是一条碎石路,坎坷不平,卡车在这种路上急驰,我们在那“小山”上被抛上抛下,似乎随时都有被甩下卡车的危险。

好不容易到了西师,已是黄昏时分,但住在哪里,却让学校管住房的人犯难了。因为这两排黄房子刚刚竣工,与之配套的家具还未到校(那时各家各户的家具如床、桌、椅、柜等均由学校配给),没想到为了卡车不空载,我们提前搬来了。望着四壁空墙,父亲毫不在乎地说:“先搬进来住着,没有床就打地铺。”于是我们就成了这两排黄房子的第一家入住者。幸而我们住楼上,可以在木地板上打地铺。当时我和哥哥、妹妹还小,觉得睡地铺很新鲜好玩,所以至今印象很深。

在一段时间里,偌大的两排黄房子,只住了我们一家人,到了夜晚,寂静得可怕。不久以后,左邻右舍才陆续搬了过来。

(四)

这两排黄房子,看似不起眼,但却是我校“藏龙卧虎”、人才荟萃之地。几十年来,在这里住过的教师、干部何其多。仅我所了解的,仅上个世纪,就有施白南、张敷荣、赖以庄、文艺陶、李景白、童辉庭、董时衡、杜子荣、李长岷、杨欣安、杨宗干、刘一层、任宝祥、漆宗棠、杨鉴秋、李嘉庆、凌道新、傅启群、李际科、席昭、高振业、何其恺、张增杰、汪盼霞、尚莫宗、

陈晓曦、谢理、苏天辅、邱曼君、何良骥、刘惠君、时声、杨定中、黄大秀、林序达、秦效侃、钱仕廉、钱荣锦、王兴运、杨群章、刘金秀、谭中开、李明允、李祯孝、张素英、孙兴斋、向国璋、邓明秀、陈德煊、景丕焕、赵汝植、李蜀光、江能咏、阎童、孙法理、彭新鼎、廖笃琼、杨秀、张翠芳、薛镜明、江家骏、冯昌敏、陈承志、陶燕云、沈来清、魏运芳、李绿漪、谭明初、夏学清、邹光华、李克文、周光群、黄淑君、罗康英、杨淑珍、杜浦、周尚芬、黄子琼、陆一录、陈永生、梁白云、成联辉、王庆光、贺南、蹇秀君、湛培书、吴明书、沈孝儒、李定慧、刘西耕、张小真、王玉书等等，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在这几十年中，不少教师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与才华离开了人世，但他们无怨无悔，因为他们桃李满天下，学生们正在继续着他们未竟事业。

(五)

这两排黄房子默默无声，但它们却见证了学校的风云变幻。在那极“左”的年代，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而在这个“旧”知识分子聚集之地，自然也成了运动的焦点。1957年反右斗争，1958年拔“白旗”，1959年“反右倾”，1963年“四清”运动，不少教师因为是运动对象而被灾蒙祸，含冤受屈，妻儿受牵连，家庭陷苦难。特别是在“文革”中，不少教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遭批斗、抄家、戴高帽、挂黑牌，关进“牛棚”，饱受折磨。

值得一提的是，我家和住在这里的几十户西师教职工在“文革”期间曾一度被迫搬出了这两排黄房子，离开了北碚。那还是在1970年初，根据林彪发出的第一号紧急战备动员令，决定将远在东北，靠近“苏修”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一部分迁到西师来，又要西师举校搬迁到万县地区。消息传来，全校震惊，群情激愤，从校领导到每一个教职工，都一万个不同意，曾以各种方式向上反映，抵制搬迁。但毕竟胳膊扭不过大腿，既然是副统帅林彪控制的中央军委办事组决定的，谁能抗得住？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全校于1970年11月被迫迁到梁平县、忠县的三个中学，一个师范学校等多处地方，一个完整的西师，顷刻间被搞得四分五裂。在那场悲壮大搬迁中，我家也和住在黄房子的几十户西师教职



黄房子近照

工一起硬被搬了出去。

那个时候，我家住在忠县二中由教室临时改造的房子里，生活极不安定。我们虽然十分怀念已远隔千里的黄房子，但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还有搬回去住的一天。谁能料到，搬出去还不到一年，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林彪、叶群在仓惶出逃中，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这一结果竟然促使了西师搬回北碚原址。据《西南师范大学校史》记载：“1972，在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的斗争中，教职工把迁校问题同林彪联系起来进行批判，指出哈工大和学院的搬迁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的一部分。”学校还以全校教职工的名义写了一个报告。这份报告义愤填膺，指出“哈工大强行迁入西南师院和西南师院被迫让出，都是在林彪的第一号紧急战备动员令后进行的，是直接对抗中央文件精神”，是“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是极‘左’错误路线的产物”。这样的上纲上线，这样的理直气壮，使当时的上级领导只好同意西师搬回北碚原址。《西南师范大学校史》称西师回归原校址，“是广大教职工在‘文革’中抵制‘左’倾错误的巨大胜利”。

1973年初，我家也终于搬回了西师，但此时黄房子里仍住着滞留未搬的哈工大教职工，我们只好暂住在李园学生宿舍里。当时西师“派性斗争”还存在，“抢房子”事件时有发生。为了能搬回黄房子老住处，母亲

硬着头皮多次去“拜访”住在黄房子我家的哈工大住户，请他们走之前千万不要让别人“抢占”进来。记得那家哈工大住户是一对憨厚的东北人，虽与我们素不相识，但对我们搬回原住处的强烈愿望十分理解，在他们临走的前两天，就让我们先将几个大件家具搬进去，以示“房已有主”。走的前一天，又主动通知我们第二天一早到他家，将住房钥匙交给我们，以防“鹊巢鸠占”。其“交接”过程至今想起来仍令人哑然失笑。据说类似举动非止我一家，但我们终于又搬回了曾“梦牵魂绕”的黄房子。

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以后，教师们摆脱了思想枷锁，枯木逢春，精神焕发，以加倍的努力投入到教学科研之中。在夜深人静之时，两排黄房子的窗户仍透出亮光，在春风和畅的白天，常有三三两两的大学生、研究生在这里进进出出，他们向老师求教，与老师交流。这里既是他们探索求知的地方，也是他们留下美好回忆的地方。

(六)

往事如烟，旧影难寻。这两排黄房子在历经 60 年的苍桑岁月中，承载了丰厚的历史记忆。我在想，如果我校要设校级文物保护单位，那么像原西师的

大校门、办公大楼、东方红俱乐部、第三教学楼、化学化工学院教学楼、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大楼(原速成中学旧址)、现后勤集团办公地(俗称地主庄园)、办公大楼右侧凉亭、左侧花圃、吴宓先生曾住过的那栋黄色楼房以及这两排黄房子，都应属保护之列，在任何时候，都不准随意拆毁或改动原貌。如果要维护修缮，也必须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办。

校党委书记黄蓉生同志说得好：“学校不能没有记忆。一所学校如果没有记忆，也就没有历史，没有家园，没有依托，没有归属。不知吾之从何而来，向何而去！”(见《西南大学记忆》创刊号《卷首语》)而这些在建校之前和建校之初修建的老房子，正是学校记忆的重要载体和历史见证。当校友们回校时，这些老房子会唤回他们在校时那段日子的美好记忆。成语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这些老房子的存在，很多记忆将会失去。所以保护好它们，就是保护了西南大学记忆。

维护和保护好西南大学记忆，既是学校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个“西大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2009 年 11 月 27 日

(责任编辑：刘广生)



前排一幢黄房子(102—103)



中国西部科学院正面(惠宇楼)

中国西部科学院下设理化、地质、生物、农林 4 个研究所,还创办有理化研究所丛刊、地质研究所丛刊、生物研究所丛刊等刊物。中国西部科学院存在期间,生物研究所与省外的研究机构对四川及中国西部的动、植物资源作了较系统的、大规模的调查、采集和研究,大体摸清了四川的鱼类、鸣禽及植物等资源分布;地质研究所则开展了对大小凉山、古蔺、珙县、南江、绵竹、广安、南川等 60 余县大面积的地质构造、矿产资源调查和灌县松潘间地震、嘉陵江下游煤田、松潘金矿和威远油田的测量等专项调查;理化研究所的中心工作是对四川矿产及工业原料进行分析、化验,对燃料问题和应用化学进行研究,为工矿业生产和抗战服务;农林研究所开展了垦殖荒地,培育森林,对稻、麦、蔬菜、果树、牲畜进行改良等方面的研究,繁殖推广优良品种,增加农副业生产

和农民收入。其中繁殖和培育荣昌猪、北平鸭的研究有相当成绩,培植的西瓜优良品种达 10 种,还于 1937 年编著出版了《西瓜栽培法》一书,影响力遍及四川。农林研究所附设有气象测候所,这也是为四川乡村最早建立的气象测候机构,在长达 11 年里每天发气象电报至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

所(1946 年 1 月 1 日,气象测候所交由中央气象局管理)。

抗战时期,中国西部科学院成为国家科学研究的中坚与基础力量,迁到北碚的中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工业试验所、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资源委员会植物油提炼清油厂、航空委员会油料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气象



70 年代施白南教授(路坎上左 2) 带领鱼类教研组罗泉笙教授(左 3)何学福教授(左 1)研究江团人工培育



西南大学纪念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馆藏档案图片展

各类实物资料应是陈列的重点，不能简单地以文字性的描述代替实物。一个学校尤其是历史悠久的高校，她的文化内涵，必然反映为一定的文物存量，她的校史陈列馆必须尽可能地拥有相当存量的实物资料。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校史陈列馆(博物馆)，其中富集的文物，在将悠久的办学历史、厚重的文化积淀展示于当下存照于未来的同时，也将一份最好的爱校教育教材提供给了今天的师生。

同时，校史陈列馆应有历史的再观观，而实物类充盈的校史才是历史的“再现”，抑或说历史记忆的形象展现；文字描述的校史只是一种“表现”，“表现”如果缺少可信的实物资料作支撑，难免显得苍白空洞、缺少说服力和吸引力。不少高校校史陈列馆缺少感染力，大多囿此而已。

二、高校校史陈列馆“文”“物”失衡的原因

校史陈列馆何以出现“文”“物”失衡现象？以下几条不会被排除。

其一，从历史上看，中国的许多高校，在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均出现过或大或小的折腾，仅看其校址变化，即可知会结果。

除部分高校一直在原址绵延不断办下去外，相

当数量的高校校址都因故出现过或大或小的变迁。教育部所属的高校，就有像北大、清华、南开、复旦这类曾因抗日战争爆发被迫南迁，抗战结束以后才又回到原来的城市继续办学的；有像原上海交大主体部分迁往西安而成就其西安交大，所余部分在其原址上发展为新的上海交大的；有像西南大学这类不断地分分合合，在反复不断的动迁过程中，再也没有回到原址、已经找不到曾经的老家的。经验可以证明，高校校址的每一次动迁除造成仪器设备大量毁损、图书资料大量流失外，更使得学校既有文物资料大量丢失。

其二，从现实情况来看，急剧发展中的中国高校，时间正在不可避免地要把许许多多的“旧东西”遗弃，比如学校旧楼的拆除或维修改造、教工住宅的一搬再搬、电子文献对纸质文献的大量替换等等，致使学校大量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流失或消亡。

其三，从文物资料的重要生产者和潜在保存者——高校教师和校友来看，他们创造或保存的文献资料、重要的书籍手稿、名人信函笔记教案、书画艺术作品、具有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的日记年谱、最能直观地反映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活动的各类实物或照片、特殊历史时期具有教育或警示意义的生产

重返复旦大学的九旬黄钟^[1]

[1] 该钟高 40 厘米，直径 43 厘米，重 48 公斤，为锡铜合金，上有铭文“复旦大学校钟，中华民国五年冬置”，其意义相当重大。建国后渐被废，竟至下落不明。上海缪明海先生数年前从收购的废铜中发现了这口钟，并将其捐赠给复旦，使这一珍贵校史文物重回校园，在复旦大学校庆 104 周年时重与师生见面。

生活用品;等等,不一而足。这类文物过去很少系统地搜集与整理,随着生产者或保存者的离校或离世,相当部分被无知者遗弃。

其四,从陈列馆主办者看,文物的搜集与整理耗时更耗物力财力,在文物意识、文保意识缺失,经费不足的情况下,走一条靠文字描述而不是实物展现校史的沿革发展状况的既省时省力又省钱的捷径,自然成了一些高校的选择。

其五,从部分高校校史陈列馆的管理者的心态看,出于人家有我也要有的人有人在,至于该有什么、怎么有却甚少思考,更少行动。其实即便是那些经历了多次动迁的高校,每一次动迁在文物的毁损中又何尝没有创造出新的文化遗产,产生出富有新的文化内涵、足以让后人思绪万千的文物呢?

三、高校校史陈列馆“文”“物”失衡现象的矫正

要矫正高校校史陈列馆无“物”可陈现象,需首先正确认识上述“文”、“物”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多途径广纳文物。

其一,面向校内外征集,接受校史资料持有者的捐赠,这是最常用最有效的搜集方法。对确有价值并为校史陈列馆永久收藏的捐赠品,学校应予捐赠者以相应的奖励。

其二,接受转让。对珍贵的校史资料或文物,在持有者自愿的基础上,学校可以双方认可的合理价格进行购买。这类购买也可以通过拍卖市场来实现。

其三,借展。对那些学校需要而持有者又无意转让的校史文物资料,可积极寻求持有者的理解和同意,通过借用展示的方式来弥补校史陈列馆文物资料的缺失。

其四,代为保管,以“陈列”代替“保管”。对那此持有者无意捐赠或出让的有价值的校史资料文物,可争取持有者同意由校史陈列馆妥为保管,在保管中“陈列”,以“陈列”代替“保管”。代为保管与借展的不同点主要在“借展”往往是临时的,而“代为保管”是在所有权不发生变化的基础上相对长期的展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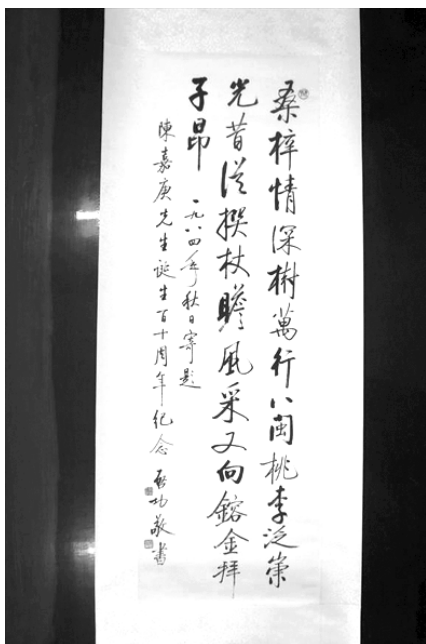
其五,复制。对那些有价值但持有者又不同意上述做法的情况下,为发挥校史文物应有的作用,通过复制方式获得校史资料的呈现作用,不失为校史资料搜集工作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其前提是必须事先求得持有者的同意。

当然这些举措的实施,不能少了对校史陈列馆的高度重视为基础、高校校史陈列馆从业人员的文物见识和文保意识为保证。

高校校史陈列馆从业人员,应是具有文物见识、文保意识的人。所谓文物见识,涉及对文物的理解力、判断力以及文物观念、文物意识,是有关文物的认识境界问题。文物见识靠的是向书本学习,即学习必不可少的历史知识、文博知识、校情校史常识、书画欣赏及鉴定知识,并养成相应的能力;更靠的是阅历和实践。只有具备相应的文物见识,才能在校史资料的发现与收集整理实践工作中做到慧眼识珠,沙里淘金。同时,这些人又须是具有强烈的文保意识的人,是有“文物过敏症”的人,这样的人善于从别人看来不起眼的陈旧品中寻找出有价值的“东西”的人,更是能够给予这些“东西”以保护与利用的人。校史陈列馆从业人员就应该成为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在校史文物资料的发现、搜集与整理中的创造性劳动,校史陈列馆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文”“物”失衡现象。(原载《中国教育报》)

(责任编辑:岑家峰)

厦门大学馆藏的启功书法



他,就是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孟杰。作为一个物理学专家,孟杰的人生不是像他所研究的物理学科那样有什么定律和规律,按他自己的说法,“在非非常规的方式下成长起来的”。也因为这种“非常规”,让他的学业富于传奇、学术成绩斐然、生活丰富多彩。

学业:在突破常规中脱颖而出

孟杰的“突破常规”是从“跳级”开始的。“读初一时,有一天我接到老师的通知,说学校准备让我跳级直接读初三,要求我马上预习初二的数学。”孟杰认真地进行了准备,可后来国家形势发生了很大改变,学校不给他破例,跳级只能取消,但是这个插曲使孟杰学会了自学。还在中学阶段时,他就完成了对高等数学和普通物理学的学习。

孟杰在学业上可以说是个天才。16岁以高分考取大学,18岁参加全国性物理学术交流会议,22岁到香港参加国际性物理学术交流会议,25岁获得博士学位,31岁被聘为北大教授,34岁时被聘为首位粒子物理与核物理专业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初中的跳级若是成功,想必这些曾经的全国性纪录还会被刷新。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天才般的人才,差点被拒之

于大学校门之外。

今天,已经是北大教授、博士生导师的他,当年参加高考时,1400度的深度近视却让他与北大失之交臂。不只是北大,分数超出北大、清华等大学录取分数线的他,因为眼睛高度近视的问题迟迟无人问津。就在孟杰即将与大学擦肩而过的危急时刻,是西南师范大学的老师慧眼识珠:人才难得,不能从事应用物理研究,那就重点向理论物理发展吧。

孟杰被留在了西南师范大学物理系。他不负厚望,本科阶段,就显示出过人的聪明才智,在大学三年级,孟杰提前一年考取了本校研究生,在林辛未、殷传宗等教授门下攻读理论物理学硕士学位。大学本科的那三年是孟杰打基础的阶段,而研究生阶段的孟杰却已进入收获的季节了。他与老师合作或独立完成了10多篇论文,并纷纷发表于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核物理动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等学术期刊上。其中,一篇入选四川省青年科技工作者优秀论文集;一篇被亚太地区物理学会会议录用,孟杰本人也被邀请在香港举行的核物理会议上作报告。

在西南师范大学,孟杰创造了多个“第一”:第一个提前一年完成本科学习考取研究生的大学生;第一个在读书期间,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学生;第一个获省级青年科技工作者优秀论文奖的学生;第一个经学校推荐为北京大学博士生的学生,同时,他也曾是硕士研究生阶段发表论文篇数最多的学生。

“西南师范大学对我的影响很大,许多老师多次打破学校的条规和惯例,给我的成长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孟杰对母校有着很深的感情。为了孟杰而“打破常规”其实不只是西南师大,当初因为视力问题与孟杰失之交臂的北大,为了引进当时已经在国际上享有较高知名度,正在日本做研究的孟杰,把各种资历、条规都打破了,想尽一切办法“操作”他回国。1997年,年仅31岁的孟杰被北大特批直接聘为技术物



读博期间的孟杰

理系教授,成为当时北大最年轻的正教授。从孟杰开始,北大从此有了一个“引进特殊人才计划”。

一位德国朋友好奇地问孟杰为何那么早就完成了学业,风趣的孟杰说“家里穷,没钱读书,所以就通过跳级的方式赶快读完算了”。

对自己的这些不寻常的人生经历,孟杰说:“我是在一个非常规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许多人顶着压力,一路给我开了绿灯,可以说我是一个欠社会很多的人,所以我需要不断努力来给予社会尽可能多的回报。”



海外研究期间的孟杰

事业:在核物理的研究中加速前进

1988年以后,孟杰离开西南师范大学到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91年获理学博士学位后到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工作。1993年,他到了欧洲,先后在德国 Rossendorf 研究中心核与强子研究所、德国慕尼黑技术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96年又到日本理化学研究所。5年的海外之行,孟杰分别与曾对世界核物理学界产生巨大影响的哥本哈根学派、慕尼黑学派和东京大学学派等合作,广泛开展了极端条件下核物理性质的研究。

5年的时间,孟杰将自己的足迹烙在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等许多科技强国的著名研究所或学术讲坛,将署有自己名字的一篇篇学术论文刊载在国内外一流学术刊物上,这些学术刊物包括《Physical Review letters》、《Physical Review》、《Physics letters》、《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物理学报》……

孟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超形变、磁转动和滴线核等方面,在磁转动物理、晕核、对关联、滴线核物理和相对论平均场理论等方面取得了国际公认的成果。在目前世界上竞争极其激烈的两个研究所——德国 GSI(能量在世界上最高)、日本理化学研究所(束流在世界上最强),孟杰的工作都被列为主要的

实验研究课题和加速器更新换代的主要物理依据,得到了许多国际著名科学家的高度评价。孟杰在滴线核研究方面,提出并建立了坐标空间的相对论介子平均场连续谱 Hartree Bogoliubor 理论,开创了全新的核结构研究领域。

自从90年代以来,放射性核束的实验技术获得了很大提高。美国、欧洲、日本以及中国等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更新换代现有设备,加强了对偏离稳定线的原子核的研究。因为在可能存在的七千多个稳定核素中,目前研究者在实验室仅仅观察到其中三分之一,而新一代的放射性核素有可能探测到另外的近五千个核素,丰富我们的核物理知识,建立了解天体演化和宇宙起源的桥梁,提供可能的广阔应用前景。对于不稳定原子核,特别是滴线原子核,传统核理论,如 BCS 理论和谐振子基展开方法等不再适用。所以国际上至今还无自恰理论对之进行解释。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孟杰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他从核子相互作用的介子理论出发,提出并建立了坐标空间的相对论介子平均场谱 Hartree Bogoliubor 理论,开创了全新的核结构研究领域。在物理学上引入了全新概念:“自由”核子可以束缚,连续谱在空间是可以定域的。他首次证明了连续谱对滴线核的贡献,微观地给出了滴线核的自恰描述,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

他利用相对论介子平均场连续谱理论预言了巨晕,所得出的物理结果已被德国、日本等研究所列为

加速器换代的物理依据之一。他与人合作完成的相对论平均场理论中的赝自旋对称性一文，解决了近三十年来核物理学中的一个悬而未决的大问题，即赝自旋对称性的物理起源。探索原子核的形变和寻找新的对称性一直是核物理领域激动人心的重要前沿研究课题，在这一方面，孟杰也有杰出的表现，他与同行专家合作在原子核磁转动理论的建立和发展方面的贡献，被誉为90年代核结构的重大成果，欧洲、美国、日本的同行们正紧张地争先验证。1996年4月版的美国国家能源部编写的《核物理长期规划》，将孟杰与同行们提出的原子核不仅有电转动，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存在磁转动理论列为振动转动研究的新成就。

报国：在祖国书写自己的物理人生

孟杰在给西南师范大学物理系的恩师林辛未、殷传宗教授的信中和北京大学的报告中曾袒露心迹：我虽然身在海外，并在相当程度上得到国际同行的承认，但我个人一直以为我的成就归功于在国内



荣获2009年(海外)华人物理学会“亚洲成就奖”后孟杰接受记者采访

受到的培养，能够回国工作并做出点贡献，一直是我个人最大愿望。孟杰清楚，尽管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我国的核物理事业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国际核物理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但同时也看到，我们与国际核物理学界的同行相比，在整体上还有一定差距，这不仅表现在研究成果上，同时也表现在科技的投入上。就科技的投入，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很难与欧美强国相比；就科技人员的收入，更是天上人间。孟杰更清楚，中国的科技事业必须在中国的土地上支撑。他在报告中殷殷陈述，早点回来，吸引一批优秀的学者，建立起一个有所作为的学术群体。他要做的事太多太多：开展相对论平均场理论的进一步研究，与天体物理相关的核结构和核反应问题的研究，高温高压等极端条件下的核结构的核反应的研究……他恨不得这些事马上就能动手做起来。情切切，意耿耿，他要让中国的工作得到国际上更广泛的承认和更高的声誉。

孟杰还希望，利用他这些年同各国核物理学界建立的广泛联系，加强与中外核物理学家的学术交流。孟杰认为，除了国家在这些方面要加大投入力度外，学成归国人员也有义务利用自身优势为促进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做出自己的贡献。为此，他创建了北京亚原子物理国际暑期学校，利用与国际同行的关系，派遣自己的学生到国外著名研究所工作学习；或是请来世界物理学前沿的科学家给同学们授课，让学生了解学术前沿。暑期学校已经成为许多物理学新人成长的摇篮，国内各高校研究生都非常向往的学术圣殿，并逐步成为中国在核科学方面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途径。

在核物理研究之外，孟杰是一个极富生活情趣的人。他爱好摄影，对光与影的审美，一点也不因为厚厚的镜片而变得迟钝；他喜欢游历，在深入核物理的研究中不忘体验各国各地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

参考文献：

①彭勇.《孟杰：核物理专家的微观人生》[J].当代贵州，2005，(22)

②沈伟红.《孟杰：诚邀后生饕餮物理大餐》[N].钱江晚报，2005-05-02

(责任编辑：岑家峰)

守望苍穹的毛泽东塑像

□文 / 邓 力

编者按：我国高校有不少毛泽东塑像，这些塑像大都是文革时期的产物。多数人认为清华大学的毛泽东塑像是全国最早修建，事实上屹立于西南大学的这尊毛泽东塑像，历史更为久远。这尊塑像始建于解放初期，由西南大学教师自主设计，坐落于西南大学大校门景区中轴线上，与身后的75级台阶、第一行政办公楼，共同构成了西南大学的一道独特景观。

站在西南大学大校门向里望去，迎面见到的是景区中心那尊高大的毛主席塑像。他老人家手持书卷，巍然站立，目光如炬，守望苍穹。

国内有一说，高校第一座毛主席塑像为清华大学建造。清华大学于1967年制作的毛泽东塑像，身穿军大衣，挥手向前，伟岸高大。此后，全国高校纷纷效仿，直到对领袖个人崇拜活动的停止。如果加以“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限制性词语，清华大学的毛泽东塑像为全国第一座之说想来没有什么不当，但撇开这一时间限制，则与事实相悖。

西南大学这尊矗立于大校门景区中轴线上的毛主席塑像，制作时间是在解放初期，远远早于清华，它出自人们对毛主席发自内心的热爱，不是“文革”产物；西南大学人很低调，不说全国第一，只说西南

地区第一，但有一点他们十分强调，西南大学这一座毛泽东塑像与诸多高校的毛泽东塑像有很多不同之处：这座塑像，领袖神态安详，平易近人，尤其是右手紧握一书卷，当是新中国的建设规划。与四处矗立的挥手像相比，它更富有内涵，也更具书卷气。毛泽东本人终其一生，几乎是手不释卷。这尊塑像的创作，比较贴切地抓住了毛泽东的文化特征。

西南大学毛泽东塑像的主创群体是该校美术教师钱泰奇等。他们塑造的毛泽东像背向高等学府，面朝一脉青山，北碚火车站似乎近在眼前，时不时有汽笛长鸣，意蕴着他老人家引领高校学人走向新中国建设的幸福远方……

钱泰奇，1945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曾任教于国立女子师范学院。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

整后来来到西南师范学院。当时学校决定由他领衔主创毛泽东塑像，原因之一是钱老师刚刚完成重庆大礼堂朱、毛井冈山会师浮雕。然而要创作毛主席大型雕像，难度委实不小。解放不久，钱老师尽管对于人民领袖的标准像了解很多，但他对毛主席身材特征的把握比如胖瘦高矮却并不十分准确。最初，钱泰奇按照自己的想象塑造的毛主席像，身穿制服，两眼平视向前，左手下垂，右手高高举过头顶，做挥手状。西南师院首任院长谢立惠教授看后说与毛主席真实形象相差太远。谢立惠是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曾多次见过毛泽东，他的意见具有权威性。钱老师据此修改，将毛泽东雕像改为左手背在身后，右手持握象征新中国建设规划的书卷。在正式放大时遇上了麻烦：塑像太大，重心不稳。折腾多日依然没法解决，学校遂从四川美术学院请来郭乾德等教授帮助解决了难题。塑像落成后引起本区轰动，到学校看望“毛主席”，一时成为当地人的一项庄严行动。知情者称，当时从大校门经过的车辆，大多要放慢速度，让乘客亲眼目睹“毛主席”的光辉形象。

今天，这座在时间上堪称“西南第一”的毛主席塑像，已经成为西南大学人记忆深处的最重要的“校园人物”。

凭借伟人气象，西南大学大校门中心景区的建筑在气势上很不一般。毛泽东塑像背后的那步步向上，横宽十余米，一气铺开5层75级的石砌大梯坎（重庆人总是管台阶叫梯坎），若自下而上望去，颇有一番“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气势，这样更衬托出毛泽东塑像的伟岸高大。

毛泽东塑像背后的75级梯坎，一级一级均由块块完整宽大的石板砌成，久经时间的洗礼与冲刷，平整之下现出灰白的印迹。台阶由下至上，次第变窄；每一层台阶的跨度颇大，最宽能够并排站立二三十人。沿台阶逐级向上，走到最顶端，便是傲然屹立的西南大学党政办公楼。这座楼的前身，最早是川东行政公署所在地。党政办公楼虽不高大，但因有那75级梯坎的烘托，正面望去，显示着不凡的气度，俨然是高等学府尊严的象征。

大校门，毛泽东塑像，75级台阶，办公楼，这是



守望苍穹的毛泽东塑像

西南大学校门景区的一个建筑组团。对于西南大学人来说，这组建筑最令人感到自豪。因为，就全国高校校门内的中心景观而言，西南大学这一组，应该说是最有气势。几十年光阴如书卷一般被一页页静静翻过。随着时代的变迁，学校不断地发生变化，在时令更替中，它逐渐步向繁荣与壮大。但办公楼与大梯坎，却总是以最初的模样，坚守着大校门。

本文选自《漫游中国大学——西南大学》，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文章略有改动

（责任编辑：岑家峰）

塔柏的来历

□口述/王远伦 郭兰整理

编者按：在我校大校门毛主席塑像的两侧有许多葱郁的塔柏，其中部分塔柏是1938年由内迁至北碚的复旦大学种植的。随后，川东人民行政公署从复旦大学旧址的校舍（时为原西南农学院校舍）中移栽过来的，这些塔柏历经了私立相辉学院、西南农学院、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见证了我校的发展历程。

进入西南大学一号门，映入眼帘的除了雄伟的毛主席塑像，便是两旁郁郁葱葱的塔柏。早在西南师范学院刚成立时，进入校门的两旁也有很多塔柏，但一九八五年，由于刮大风，很多树被大风吹倒。尽管也曾对这些塔柏进行抢救，但是多数树木过高过大，根部已经受损，最终仅有十余株保存下来。之后，学校绿化科从北碚静观买了塔柏树苗，重新按原布局补栽，这才有了如今的塔柏景观。

那么原西南师范学院刚成立时，那些塔柏是哪里来的呢？这还得从复旦大学谈起。抗日战争爆发后，复旦大学^①于1938年内迁北碚夏坝，抗战胜利后，学校迁回上海，留给北碚的除了校舍就是繁茂的花草树木，其中也包括塔柏。1946年，复旦大学留渝校友在其旧址建立了相辉学院^②，随后改为私立相辉学院。1947年10月7日，根据



倾斜的老塔柏

^①复旦大学于1939年内迁北碚夏坝，设置文、理、法、商、农五院二十二系及两个专修科，并设有科学馆、新闻馆、商科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室等，培养各类人才。广大师生高举抗战、团结、进步大旗，成立了《中国学生导报》、菊社、话剧社、文摘社、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等进步团体，创办《中国学生导报》、《文摘》、《夏坝风》等刊物和壁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使复旦成为大后方坚强的民主堡垒。

^②1946年7月，复旦大学迁返上海，复旦大学校长章益同复旦大学同学会重庆分会部分校友及四川省有关人士商定，将复旦大学所遗校址筹办一所高等学校，以作育英才，为纪念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及校长李登辉，定名为相辉学院。学院成立后，即向国民政府教育部呈请立案，教育部批复：学院名称应改为私立相辉农学院，不得兼办其他科系。1947年10月7日，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高字第54354号指令，将私立相辉农学院改为私立相辉文法学院。开设外文、文史、经济、法律四系，并附设农艺系，聘请知名学者任教。解放后，学院并入西南农业大学、重庆大学和成都财经学院等学校。



塔柏远景

国民政府教育部高字第 54354 号指令，又改为私立相辉文法学院。我也是私立相辉学院毕业的，后来留校参与筹办西南农学院。记得当时川东人民行政公署书记谢富治^③和主任阎红彦^④打电话到西南农学院^⑤，要几颗学校的塔柏。我当时也不知道谢富治和阎红彦是什么人，不敢贸然答应，便告诉他们，现在院长不在，等院长回来，请示后再回复你们。几天之后，院长出差回来，我向他汇报了这个情况，院长欣然答应给几颗塔柏。就这样，学校把部分塔柏送给了川东人民行政公署。

1952 年，中央决定撤销川东、川南、川西、川北人民行政公署，建立四川省人民政府。川东人民行政公署撤销后，人去楼空，留下了办公楼和这些塔柏。而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将设在北碚的川东人民行政公署及川东区党委的驻地作为西南师范学院新校址。所以追踪溯源，现在西南大学一号门内塔柏群中存留的十余株老塔柏其实是复旦大学的遗产。

(责任编辑 杨希)

编后记：塔柏因地理位置处于小斜坡，受气候影响较大，幸存十余株老塔柏历经风雨已出现倾斜，急需进行抢救性保护。愿塔柏伴随学校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③谢富治(1909—1972)，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率部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赫赫战绩。建国后，历任西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中共川东区委书记、川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

^④阎红彦(1909—1967)，陕西省安定(今子长)县瓦窑堡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警备第 3 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邯郸、陇海路、定陶、渡江等战役，取得显著成绩。建国后，历任中共川东区委副书记、川东行署主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

^⑤1950 年，西南文教部确定位于北碚的私立相辉文法学院所在地作为西南农学院的校址。

图书馆逸夫楼

编者按：香港慈善家邵逸夫视教育为立国之本，为此多年来尽心尽责，不遗余力。他曾说国家振兴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培养人才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据不完全统计，截止至 2008 年，邵逸夫捐助内地教育事业的资金达 32 亿元，受惠学校及教育项目近 5,000 个，遍布 31 个省、市及自治区，“逸夫楼”也遍布中国大地校园。我校图书馆新馆也是邵先生资助。自建成以来，图书馆逸夫楼作为阅览室，其优美的环境、良好的学习氛围和先进的基础设施得到了师生们的高度评价，现已成为校园中重要的一景。



逸夫楼远景

邵逸夫，著名的香港爱国实业家，乐善好施，尤其关注教育，捐资助学。西南大学有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坐落在融汇广场边的一个小山头上。这座图书馆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由邵逸夫先生赠款 1000 万港元和原国家教委拨款 330 万元人民币建设

起来的。建筑宏伟壮观，环境幽雅成趣，是学校的重要景点之一。

西南大学的前身之一的西南师范大学，原有一座图书馆，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根据当时学校规模与建设标准修建的，建筑面积达 6000 平方米。那时高校新建图书馆的还不多，图书馆的建成，基本上满足了学校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对学校的发展曾起过积极地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进入一个改革和高速发展的新时期，学校规模扩大，学生人数急剧增加，科学研究蓬勃发展，都对学校图书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60 年代修建的图书馆已显得陈旧落后，远远不能适应学校教学、科学研究和事业发展需要。学校决定在原有图书馆的基础上，扩建 8000 平方米的新图书馆，与旧图书馆统一配套使用。这一计划得到了原国家教委的批准，并决定向西师拨款 330 万元人民币，用于扩建新

馆。但是,330万元的资金,对于扩建新馆,无论如何都是不够用的,学校还需筹资金以补充。

1986年秋,原国家教委在云南大学召开会议,公布了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行政主席邵逸夫先生决定捐赠1亿元港币巨款,赞助内地发展教育事业的消息,并提出了拟接受邵先生第一批赠款10所学校的名单,其中就包括西南师范大学,每校资助港币1000万元。学校党政领导及时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将邵先生1000万元港币的赠款,与国家教委原决定投资的330万元人民币合并使用,作为新扩建建筑面积为10320平方米图书馆的投资。学校的这一决定,很快就获得了国家教委的批准和邵逸夫先生的同意,按工程进度分期下达了投资。

邵逸夫先生的赠款,为学校现代化图书馆的建设奠定了雄厚基础。学校扩大了新图书馆的拟建规模,由8000平方米扩大为10320平方米,提高了建设标准。同时,为感谢邵先生资助,学校决定将新扩建的图书馆,定名为逸夫楼。

逸夫楼从1987年设计、奠基施工到1989年9月工程竣工,11月20日举行图书馆逸夫楼工程落成典礼,总计两年时间。

图书馆逸夫楼的馆址与旧馆建筑在同一地点相邻并存。为了使新馆与旧馆协调统一,新馆逸夫楼在现址台地的东头,与旧馆互成犄角。附属建筑学术报告厅与陈列厅布置在主楼的西南角,顺应地形依山就势,在不同高度留出各自的出入口,同时又与主楼



图书馆逸夫楼



逸夫楼阅览室

紧密联系,既可分散使用互不干扰,在相互衔接上又成为协调一致,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气势更加雄伟。新旧楼间留出大片空地,配以庭园绿化、小型雕塑、花圃草坪、花廊水池、道路台阶,使新馆与旧馆协调配合,成为学校“大花园”中一朵奇葩。

逸夫楼内有天井式的内庭园,围绕内庭园四周布置各类用房。大厅中央布置反映古今中外科技与文化发展的云石饰面的巨型影壁屏风,内庭园中设有观赏水池、人像雕塑、花坛等天井庭园,通过进厅影壁屏风与外部庭园沟通,使内庭无闭塞之感,取得较好的通风效果。

庭园建设是整个图书馆工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利用大小保坎、台阶坡地、石级小道、花坛草坪、走廊通道、喷泉假山、雕塑以及灯柱等小品,组成了一幅优美的室外画卷。从图书馆正面拾级而上,在第一个小平台上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前面提到的郭沫若为《桃园》文学杂志题写的《桃园花盛开》诗碑;循级而上便是美丽多姿的庭园,别开生面的雕塑小品巧插其间,生机盎然的庭园绿化使人顿觉豁然开朗、别有洞天之感。

1990年2月12日至15日,原国家教委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邵氏工程建设评奖大会,原西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逸夫楼获得第二名,除授予奖杯、奖状外,还获得了40万元港币的奖金。

本文选自《漫游中国大学——西南大学》,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责任编辑:郝小玮)

藏珍百年 文化传承

四川大学档案馆

□文 / 刘广生 编辑整理

档案馆 校史办公室 校史展览馆

编者按：四川大学档案馆是全国高校中规模最大、馆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档案馆之一，拥有目前全国高校中建筑面积最大的校史展览馆。四川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连续完整地记载了四川大学从建立至今 110 多年来创建、发展、联合、壮大的历程。四川大学档案馆依托厚重校史，秉承馆风、馆训，传承大学文化，弘扬川大精神。

“以史为鉴，温故知新”、“自修自爱智识之府”，打开四川大学档案馆主页，映入眼帘的首先是四川大学党委书记杨泉明、校长谢和平的题词。苍劲的字体在档案馆主页上显得格外醒目，也凸显着四川大学档案馆所承载的文化精神和历史责任。档案馆主页栏目分明，简洁明了，也显现出档案馆工作的有条不紊，整齐有序。滚动着的四川大学老照片、学校名人及校友名言，更增添了四川大学深厚的历史氛围及浓重的文化气息。

浏览档案馆网站，翻阅各栏目板块，盘旋脑海的始终是“历史”与“文化”两个词。历史和文化总是交融在一起，仿佛提到历史抑或谈及文化，两者都不能离开彼此。历史赋予文化以厚重，文化给予历史以内容。四川大学“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校训与“自修自爱智识之府”的档案馆馆训一脉相承，而档案馆馆徽直接荫承学校校徽，厚重的历史与文化也在此交集。

以史为鉴
温故知新
杨泉明

四川大学党委书记杨泉明题词



四川大学档案馆大楼

一、四川大学档案馆馆藏资料珍贵丰富，以史为鉴，以他为鉴

四川大学档案馆是由分别成立于1987年和1986年的原四川大学档案馆、原成都科技大学档案馆和原华西医科大学档案馆两次合并而成。1998年分别达到档案管理国家一级和二级标准。而四川大学校史办公室成立于1984年，以“存史、资政、研究、育人”为宗旨，办公地点则设在四川大学校史展览馆，四川大学大学文化研究中心同时也设在此馆。四川大学档案馆（校史展览馆、校史办公室）现有档案馆和校史展览馆两栋大楼，共有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是全国高校中规模最大、馆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档案馆之一，也是目前全国高校中建筑面积最大的校史展览馆。

四川大学档案馆馆藏文献资料丰富，内容覆盖面广，时间跨度长。馆藏综合档案共22个全宗，10万余卷。其中，教职工档案2万卷，学生档案5万卷。其馆藏档案连续完整地记载了四川大学（含原四川

大学、原成都科技大学、原华西医科大学）从建立至今110年来创建、发展、联合、壮大的历程。四川大学档案馆馆藏全宗22个，溯自中西学堂档案，包括四川高等学堂档案，四川通省师范学堂档案、公立四川法政学校档案、四川省立农学院档案、四川存古学堂国学学校档案、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档案、国立成都大学档案、国立成都师范大学档案、公立四川大学档案、国立四川大学档案、国立成都理学院档案、四川大学档案、四川大学工学院档案、自贡工业专科学校档案、川南工业专科学校档案、四川化工学院档案、成都科技大学档案（包括成都工学院档案）、私立华西协合大学档案、华西医科大学档案（包括华西大学、四川医学院时期）、四川联合大学档案及到1999年以后的四川大学档案。现有各类档案15万卷。管理的档案有人事档案和综合档案两大类。人事档案包括教职员工和在校学生档案；综合档案分为党群类、行政类、学生类、教学类、科研类、设备类、产品生产与科技开发类、基建类、出版类、外事类、财会类等

增添不尽的力量;传承百年智慧是我们的天职,传播先进文化是我们的方向。”其中,“自爱自修”语出张澜(前四川大学校长,新中国第一届国家副主席):“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智识之府”语出任鸿隽(前四川大学校长,著名化学家和教育家):“大学者,智识之府也。对于既往,大学为其承受之地。对于现在,大学为其储蓄之所。对于将来,大学为其发生之机。”而四川大学档案馆的馆风则为“甘于清贫,乐于奉献,勤于思考,善于创造。”坚持对学校高度负责和对历史高度负责,自觉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团结协作的工作态度、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顾全大局的思想品质和主动发展的进取意识,努力把四川大学档案馆建设成为:“人人主动学习,人人热爱学习,人人善于学习的学习型档案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和谐档案馆;着眼未来发展,促进学校发展,体现自身价值的品牌档案馆;领导班子好,职工队伍好,管理制度好,发展业绩好,群众反映好的优秀档案馆。”

四川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公室)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和档案编研,在学术研究和交流中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果。自1985年以来,四川大学档案馆组织编写出版了十几部图书,包括《四川大学史稿》(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年)、《华西医科大学校史(1910-1985)》(四川教育出版社,1985年)、《成都科技大学史稿》(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89年)、《川大英烈》(四川大学出版社,1999年)、《华西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春华秋实:华西医科大学档案事业90年》(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锦江怒涛》(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四川大学史稿(五卷本)》(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四川大学历史文

化长廊》(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世纪弦歌 百年传响:四川大学校史展(1896-2006)》(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抗震救灾:川大在行动》(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上林春汛: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档案管理和校史工作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四川大学:历史·精神·使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发表论文上百篇。

四川大学档案馆主页开辟了“川大在线:四川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专题”;优美的电子书详尽展现了四川大学的精神风貌、“四馆一廊”,营造出创新人才培养的新环境、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传承世纪名校文化传统,四川大学青年志愿者在行动、四川大学大学文化蓝皮书等,努力建设体现社会主义特点、当今时代特征、研究型大学特质和四川大学特色的新型大学校园文化。同时,编辑档案馆管理和校史工作简报《兰台资讯》,总结工作经验;加强与档案



四川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成都华西大学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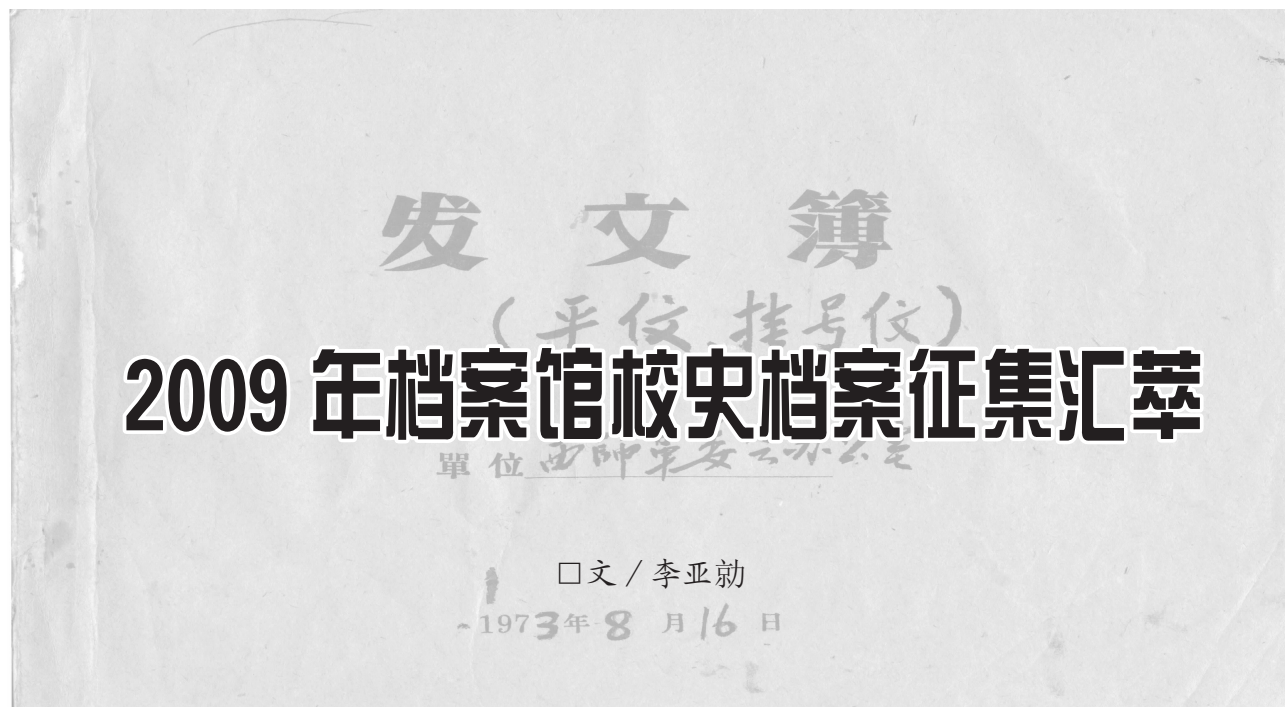
协会之间的学习工作经验交流,开设学习之窗,加强档案馆人员的政治学习、业务学习;“故事川大”,记录了四川大学发展历程的点点滴滴,这些闪光的精彩全部展现,更能让人深刻地认识四川大学,感受四川大学以校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和校风“严谨、勤奋、求是、创新”为核心的大学精神和文化。

四川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公室、校史展览馆)以校风、校训为核心的川大精神为指引,坚守档案馆馆风、馆训,依托厚重校史文化,正努力为四川大学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 ① 四川大学档案馆网站:<http://archives.scu.edu.cn>

(责任编辑:刘广生)



经过一年的外出收集和向社会各界的广泛征集,2009年我校档案馆馆藏的校史档案得到了极大丰富。由于档案馆正在筹建“侯光炯^[1]纪念馆”,收集到的关于侯光炯院士的书籍、信件、实物等等尤为丰富。以下是收集到的校史档案荟萃。

(一) 书籍类

收集的书籍中关于侯光炯院士的较多,包括:侯孝祖^[2]捐赠的1958年侯光炯工作笔记《幸福生活》;侯光炯著书《辛巳旅赣纪念册》;刘秉臣^[3]写的《踏遍青山人未老——土壤学家侯光炯传》和侯啸碚^[4]写的《情》(复制件)。余杰^[5]捐赠的侯光炯藏书——《北碚志》、《云南土壤》;侯光炯著书《农业土壤生理性》和侯光炯主讲的《高中地理选集(第二册)》;以及余德庄^[6]主编《世纪情结侯光炯的人生道路》和1997年西

农党委宣传部编印的《光辉的榜样永远的怀念——缅怀侯光炯教授文集》。资环院捐赠的1964—1968年间侯光炯《个人规划》(底稿)。长宁免耕所捐赠的侯光炯藏书《土壤微生物和高等植物》、《四川科技精英》(第一集);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1981年编写的《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各研究所高级研究技术人员简介》(内部资料)。侯啸碚捐赠的侯光炯著书《紫色土专论(上卷)(提纲)》、《紫色土的肥力和增产途径(提纲)》和《复杂多样的紫色土肥力类型(第二章)》以及《建设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等18本与土壤相关的书籍。此外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2009年9月编写的《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三农”模范人物风采录》等等。

其他书籍还有:邓一民^[7]捐赠的蒋同庆^[8]著《蚕丝

[1] 侯光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土壤学开拓者与奠基人,西南农学院教授。

[2] 侯孝祖:侯老之子,西南大学副教授。

[3] 刘秉臣:转业军人,侯老在简阳蹲点时曾和侯老一起工作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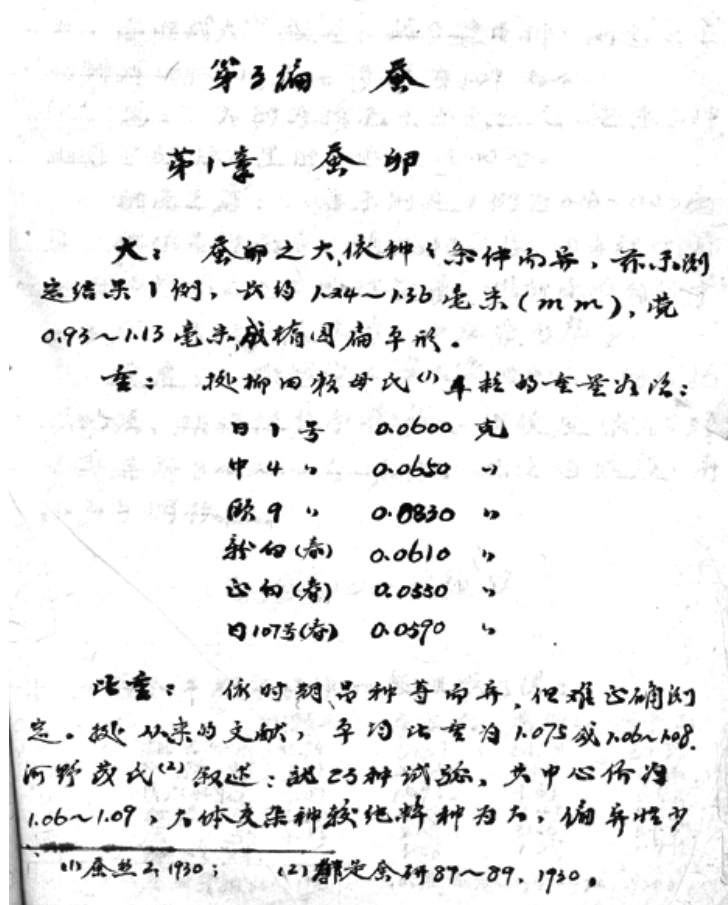
[4] 侯啸碚:侯老小女儿,高级工程师。

[5] 余杰:侯老学生,西南大学教授,在侯老身边工作多年,曾任土化系主任、资源与环境学院总支书记。

[6] 余德庄: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曾多次采访侯老。

[7] 邓一民:西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教师。

[8] 蒋同庆:家蚕遗传学家,西南农学院教授。



邓一民捐赠的蒋同庆著《蚕丝化学》手稿

化学》。余杰捐赠的《四川省土壤区划(初稿)》、《土地所土壤学科发展史》、《紫色土》、《水田自然免耕技术提纲》等8本与土壤学相关的书籍。资环院捐赠的黄宗壤^[9]先生书法作品《志为中华培沃土壮心犹健尚奔

腾;提携后进育桃李喜看神州满地春》、MINERAL NUTRITION OF PLANTS 和 THE NATURE AND PROPERTIES OF SOILS。刘佩瑛^[10]捐赠的《刘佩瑛文集》。谢世杰^[11]著书《与时俱进 建设政治文明》、《勤奋拼搏 努力开拓前进》。龙在忠^[12]捐赠的《下关土壤》和《贵州土壤》。此外还有《储藏物昆虫和农业螨类研究——李隆术^[13]论文选》、《土壤学附地质学基础》(上、下册)、《蒋书楠^[14]文选》、《何文俊^[15]教授纪念集》、《蒋同庆^[16]教授业绩》以及《西南师范大学校庆50周年,院系丛书——数学系、财经系》和我校在校本科生所写《西南大学校园高等植物学习指南》等等。

(二)信件类

2009年收集到的与侯光炯院士相关的信件有：

余杰捐赠的1990年侯光炯写给付显兰^[16]同志和学校党委各位领导同志的信(复制件)和1962-1966年间侯光炯写给余杰等人的信件共13封。王文富^[17]

捐赠的侯光炯给王文富、谢联辉^[18]的信件一封。

资环学院捐赠的蒲富永^[19]分别于1976年6月2日和1976年7月4日在上海向黄世坤^[20]等人报告侯老病情的信两封;1990年5月21日李庆逵^[21]写给

[9] 黄宗壤:笔名隋侃之,书画家、诗人、作家、书画教育工作者。
 [10] 刘佩瑛:教授,曾任原西南农学院园艺系副系主任,魔芋研究中心主任。
 [11] 谢世杰:原四川省委书记,毕业于原西南农学院。
 [12] 龙在忠:侯老助手,与之朝夕相处达八年之久。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土化系,并留校工作。
 [13] 李隆术:西南大学植保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14] 蒋书楠:教授,曾任原西南农学院教务长。
 [15] 何文俊:植物病理学家,曾任西南农学院教授、副院长。
 [16] 付显兰:副教授,曾任西南农业大学土化系总支书记。
 [17] 王文富:侯老的学生,毕业后在云南省农牧厅土肥站工作,曾和侯老在一起搞土壤普查。
 [18] 谢联辉: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 蒲富永:教授,侯老学生,曾任土化系总支书记。
 [20] 黄世坤:侯老学生,曾长期和侯老一起工作。
 [21] 李庆逵:(1912.2—2001.2),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一九四九年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理化系师生合影

侯光炯的信件一封和侯光炯在成都省科委写给黄世坤的信件 19 封。

李印先^[22]捐赠的 1994 年 9 月 5 日侯光炯写给李印先的信件一封和 1994 年 10 月 29 日侯光炯写给李印先、毛建华^[23]的信件一封(复印件)。

还有侯光炯寿辰时收到的贺信 25 封,其中包括分别来自四川农业大学(1990 年 6 月 1 日)和北京农业大学(1990 年 5 月 25 日)的科教工作六十年暨八十五寿辰贺信两封。

此外还有侯啸砬捐赠的侯老子女捐献侯光炯院士遗物的信一封,1984 年 9 月 22 日中共长宁县委办公室给侯老的信函一封,1994 年的信函一封和 1985 年宜宾市领导给侯老的信函一封,以及张世贤^[24]给侯老的信函一封等等。

(三)照片类

照片中与侯光炯相关的有:侯孝祖捐

重庆教科院巴蜀实验学校 CHONGQING JIAOKEYUAN BASHU SHIYAN XUEXIAO

西南大学档案馆(电话 68252544, 68251791)

蒋倩女士:

群捐上民国三十八年(即一九四九)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理化系照片一份给贵馆。

该照合影后不久,重庆即解放,这应该是女师院的最后绝照,地点在重庆黄桶坪孔四川美院小礼堂,集中前排居中者(记不清),好象解放后在西南师范学院任副院长。

该照的收藏者为女师院化学教授谈成荫先生(前排右起第六人),谈先生于一九六零年病故。

该照的捐赠者为谈先生的子女们:谈津生、谈肥生、谈永平、谈谈。

该照的捐赠者认为,将该照原件交给贵馆保存最为妥善。

该照的捐赠者希望你们能复制一份给我作永久的纪念,望在档案中保留我的上述说明。

敬礼,祝蒋女士安康,祝西南大学蒸蒸日上

谈津生, 电话 62773390
13709412724

联系地址:南岸巴蜀实验学校高复课班

地址:南岸五公里

电话:(023)62761888 62760111

捐赠者对 1949 年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理化系师生合影说明

[22] 李印先:在重庆市土研室工作,曾长期和侯老一起工作。

[23] 毛建华:在重庆市土研室工作,曾长期和侯老一起工作。

[24] 张世贤:农业部农业司原司长,农学教授。

党校教育研究会授予西南大学党校促进全国高校党校事业发展贡献奖奖牌。

(六)其他资料

资料中与侯光炯相关的有：

侯孝祖捐赠的侯光炯 1956 年 3 月入党后的日记、1953.3.30—1953.7.13 车里区调查日记、1952 年 9 月工作日记、1970 年 7 月 28 日红岩岭工作日记（歌乐山林场油橄榄病害调查）；以及侯光炯关于土壤方面的十七张手稿和美国国家土壤资源保持机构 Arnold 的文章“相逢何必曾相识”（英文版复印件，与

中文版本合为一件）。

余杰捐赠的 1956 年 4 月 26 日侯光炯先进工作者纪念证；1995 年侯老与其婿高惠民^[30]的谈话、讨论结果（复制件）；1985 年 2 月领导、有关部门、单位给侯光炯的题词、评价；1987 年 4 月侯光炯在省科技进步奖授奖会上的发言；侯光炯《川西主要土类施用氮磷肥配合法及其影响土壤物理性程度之研究》手稿两张；1991 年 7 月侯光炯“对于根治长江流域旱洪灾害的几点意见”等三篇与土壤学相关的文章；1996 年 11 月 7 日重庆晨报刊登的文章《大地之

相逢何必曾相识，

全宗号	目录号	室号	件号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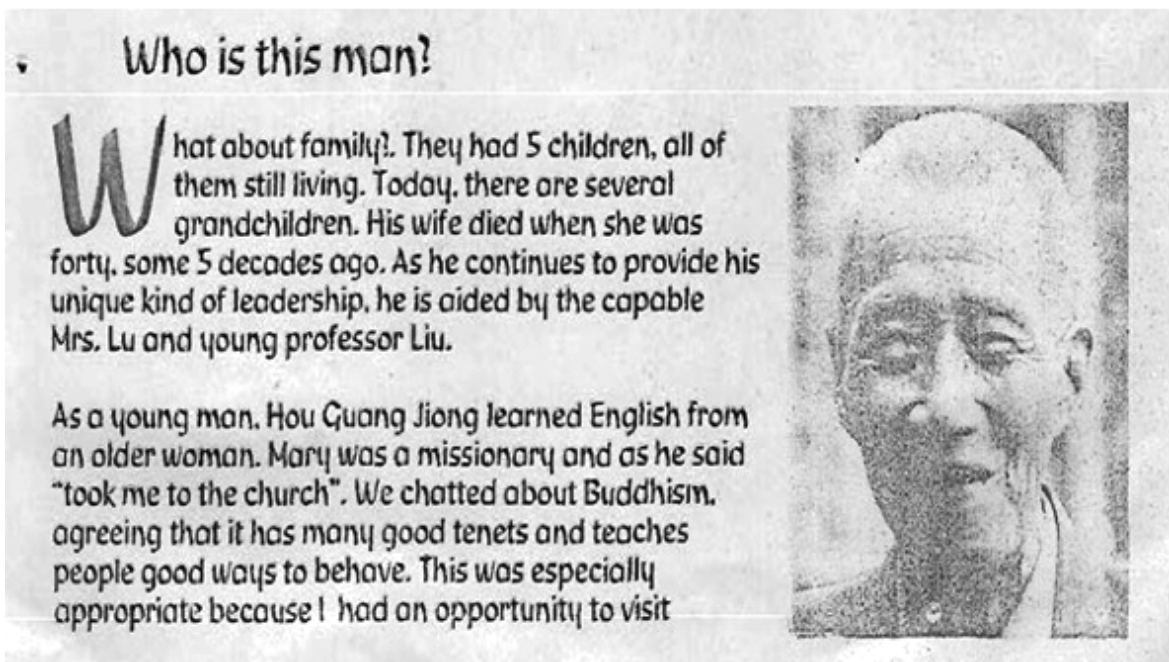
——美国国家土壤资源保持机构 Arnold 的文章

一切的开始……

从一位老前辈和他的弟子们慢慢走出南大
农业大厦的大厅，走向土壤保持中心的团体办
公室。这是七月末的某一天，他曾来过华盛顿
——1955 年在英国牛津召开的世界土壤科运代表大
会之后——而现在已是 1991 年，他已回来了。那些他
提起的人，如雷蒂斯·马伯特，罗伯特·约翰
特，古德·索普和理查德·布拉德菲界德，都
已仙逝良久，^{他的}姓名已长存于世。当侯光炯教授
细怀着五十年前的那次探访时，时间似乎停
下脚步，静静地让他捕捉着回忆的点滴。他
的记忆早已超越了我们短暂的述说，我们坐在

美国国家土壤资源保持机构 Arnold 的文章“相逢何必曾相识”

[30] 高惠民：侯老女婿。



“相逢何必曾相识”英文版复印件片段

子——侯光炯》；各级代表发表的向侯光炯学习的决定和其他个人缅怀侯光炯的 13 篇文章。

资源环境学院捐赠的侯老 1976 年在川医住院时黄世坤整理的专家会诊记录和 112 份与侯光炯奖学金相关的资料，如侯光炯奖学金评选暂行条例、关于侯光炯奖励基金筹集情况的报告、2001 年-2009 年间“侯光炯奖学金”评选材料八十九份；以及赞扬侯光炯功绩的相关文章五份。

侯啸碚捐赠的农牧渔业部办公厅的函件；侯光炯对编书工作的意见；1993 年 3 月 6 日侯光炯讲话；1993 年 2 月 16 日侯光炯在泸州市土壤学会上的发言提纲；侯光炯书稿收到与未收到签收单（复印件）以及三十八份由侯光炯撰写的与土壤学相关的文章和肯定侯光炯功绩的文章二十三篇。

其他与侯光炯相关的资料还有：李印先捐赠的由他撰写的文章“我对侯老师学术思想的一点体

会”。长宁免耕所捐赠的由侯光炯为指导教师，1994 年曾希柏撰写的西南农业大学研究生论文选题报告（土壤耕作肥力的研究）。2009 年 9 月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庆市总工会、重庆警备区政治部发表的《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重庆杰出贡献英模》（内侯光炯院士、黄希庭^[31]教授、张群力^[32]）。

资料中关于袁隆平院士的有：校友办提供的 2009 年 9 月 10 日“杰出校友袁隆平院士塑像揭幕仪式”议程、活动方案、新闻稿，以及揭幕仪式上的主持词、讲话稿等。

与叶谦吉相关的资料有：《叶谦吉教授百岁诞辰庆典活动》，叶谦吉教授学术思想发展纪实（初稿），叶谦吉工作简历，叶谦吉教授 1980-1996 年间主要论文、专著目录。

其他资料有：余杰捐赠的《自然免耕试验研究工

[31] 黄希庭：中国心理学会第七届和第八届副理事长兼教学工作委员会主任，西南大学心理学博士生导师。

[32] 张群力：现为重庆一中办公室副主任，中学政治研究院，荣获“重庆市首届名师奖”。

作情况汇报》,《推广水田自然免耕技术是改造利用冬水田的战略措施》,1990年12月《西南农业大学关于建立四川自然免耕研究所并请求给予资助的请示》(校行字[1990]第24号)(复印件)和长宁县人民政府关于呈送《实施“自然免耕生态农业”示范县建设方案》的报告(长宁府[1992]77号)以及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推荐表(初稿)。王文富捐赠的1990年4月《全国土壤普查科学技术顾问组西南组活动文献资料汇编》。刘重来^[33]于2009年12月捐赠的朱自清^[34]先生和闻一多^[35]先生的《西南采风录》序文手迹扫描件和闻一多、朱自清珍贵手稿影印件两份。教务处提供的2009年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表彰第五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奖教师的决定(复印件)和2009年教育部关于批准第六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获奖项目的决定(复印件)。李兰捐赠的张永青的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一次代表大会特邀代表签到卡及特邀代表证(NO.0008)和她口述资料《求真 求实 解校史谜团》手改稿。此外还有发文簿两份,分别是1973年8月16日西师革委会办公室(平信、挂号信)发文簿和1973年9月27日发文簿(机要信件);以及1973年8月10日西师革委会办公室收文簿一份。还有黄伦先^[36]忆侯光炯的随笔一篇(手稿影印件)等等。

以上仅为2009年我校档案馆收集的校史档案的简介,由于内容过多而且庞杂,在此就不一一列出。

(责任编辑:刘广生)

校 史 求 证

来到西南大学,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座雄伟、壮观的学校大门,它开启了我们进入知识的殿堂,指引着我们迈入心中理想的象牙塔。可是,西南大学的正校门(一号门)及其周围景观是谁设计的,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呢,我们却不得而知,所以,本期杂志向全校师生及各界校友求证:

西南大学正校门(一号门)及其周围景观由谁设计的?什么时候建成的?

请知情者与我们联系。电话:023—68252544

15923240270

邮箱:xdjy2009@126.com

(责任编辑:徐 林)

[33] 刘重来:教授,刘兆吉教授之子。

[34] 朱自清:现代散文家,语文教育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

[35] 闻一多:原名闻家骅,著名学者,新月派代表诗人。

[36] 黄伦先:1965年毕业后留校,西南大学副研究员,曾跟侯老一起工作过。

西南大学关于征集 校史资料及实物的通知

校内外各单位、海内外校友、离退休老同志、全校师生员工及社会各界人士：

校史资料及文物是一所高校文化传统和风格特色的集中体现，也是储存历史记忆、传承大学精神的重要载体。为了缅怀创业历程，丰富校史文化，总结办学经验，弘扬大学精神，推动学校更好更快发展，特向关心和支持学校建设与发展的校内外各界人士征集校史资料及实物，现将征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集范围

与西南大学发展历程相关的川东师范学校乡村师范专修科、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私立华西协合大学、私立相辉文法学院、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农学院、四川畜牧兽医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西南师范大学、西南农业大学等的校史资料及实物。

二、征集内容

1. 各发展时期学校领导、知名学者的

任命、聘用、奖励等文件材料，包括其撰写、编著的文章和出版物、工作笔记、日记、教案、手稿、信函以及个人照片和使用过的有关典型实物等。

2. 中央、省部领导、社会知名人士及重要嘉宾来校视察、参观、访问、演讲时的照片、录音带、录像带、题词、记录、文章及刊有相关报道的出版物等。

3. 学校各个时期（特别是民国时期）的印章、校徽、个人证件（如：工作证、学生证、借书证、毕业文凭、学位证书、毕业分配派遣证等）、纪念章、票证、录取通知书等。

4. 学校各个时期风貌的照片、匾额和带有校名印记的物品等；各个时期学校与国内外机构、大学交流合作的资料、实物；各个时期学校机构部门、学生组织、社团活动材料及其出版刊物。

5. 师生和校友参加国内外重大活动（包括社会活动、学术活动、重要比赛或评比活动）形成的文档（聘书、奖状、代表证、证书、通知等）、实物（奖品、纪念品）和照片、声

像资料等。

6. 历届毕业生合影照片、毕业纪念册、同学名录、师生间赠言、题录等。

7. 反映学校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科学研究、教育教学及管理成果的著作、论文、作品、照片、音像、奖品、实物等。

8. 反映或记载学校校友重要成就或在社会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事迹材料，包括照片、音像、实物、书刊等，对学校发展有突出贡献的社会各界人士的相关资料。

9. 反映各个时期学校的教育思想、办学经验、教书育人、师生情谊、校史掌故、校园逸趣、学生生活以及学校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的回忆。

10. 其它以上未详细列及，但能够典型反映学校历史的有关材料和实物。

三、征集方式

1. 接受捐赠。捐赠资料及实物所有权归学校，学校对捐赠者颁发捐赠证书，以致谢忱。

2. 代管、复制。对特别珍贵的资料、实物，本人(或亲属)有保存意愿的，学校档案馆可代为保管，也可复制或翻拍后将原件归还本人(或亲属)。

3. 接受出让。愿意将校史资料及文物出让给学校的，可与学校档案馆联系，在鉴定、确认后，协商双方可以接受的价格，签订出让协议。

4. 文字或口头提供。撰写自己或他人在校期间工作、学习和生活方面的回忆文章，可

以纸质或电子的方式送寄给学校档案馆。对年事较高或书写不便的老同志、老校友，可与学校档案馆联系，由档案馆派专人前往记录整理。

四、其他说明

1. 提供资料及实物时请附简要的文字说明：包括时间、地点、事由、主要参与人的姓名、时任职务、提供(或拍摄)人姓名、现从事职业、与学校的关系等。回忆文章请在末尾注明作者真实姓名、在校时间与单位、在校时的职称职务、现工作单位及联系方式等信息。

2. 凡无偿捐赠具有较高价值档案资料者，捐赠者可优先、无偿利用所捐赠的档案资料，并可优惠利用档案馆全部开放档案。

3. 凡捐赠者享有著作权的档案资料，档案馆将依法予以保护。捐赠者有特殊要求的，档案馆将本着对国家、对社会、对个人有利的原则予以尊重。

五、联系方式

1. 联系单位：西南大学档案馆

2. 联系人：杨伟 李春明

3. 联系电话：023—68251791（李春明）
68252544（杨伟）

4. 电子邮箱：xddag@swu.edu.cn

5. 通讯地址：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1号
西南大学档案馆

6. 邮编：400715

西南大学档案馆
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日

